

●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 主编 任继愈 ●



ZGWHHSZS

# 中国印刷史话

张绍勋



山东教育出版社



●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 主编 任继愈 ●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 中国印刷史话

张绍勛

060322



大学图书馆 0006618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史知识丛书

任继愈 主编

**中国印刷史话**

张绍勋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frac{7}{9}$  印张 4 插页 52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700

ISBN 7—5328—1186—7/G·1001

定价 2.06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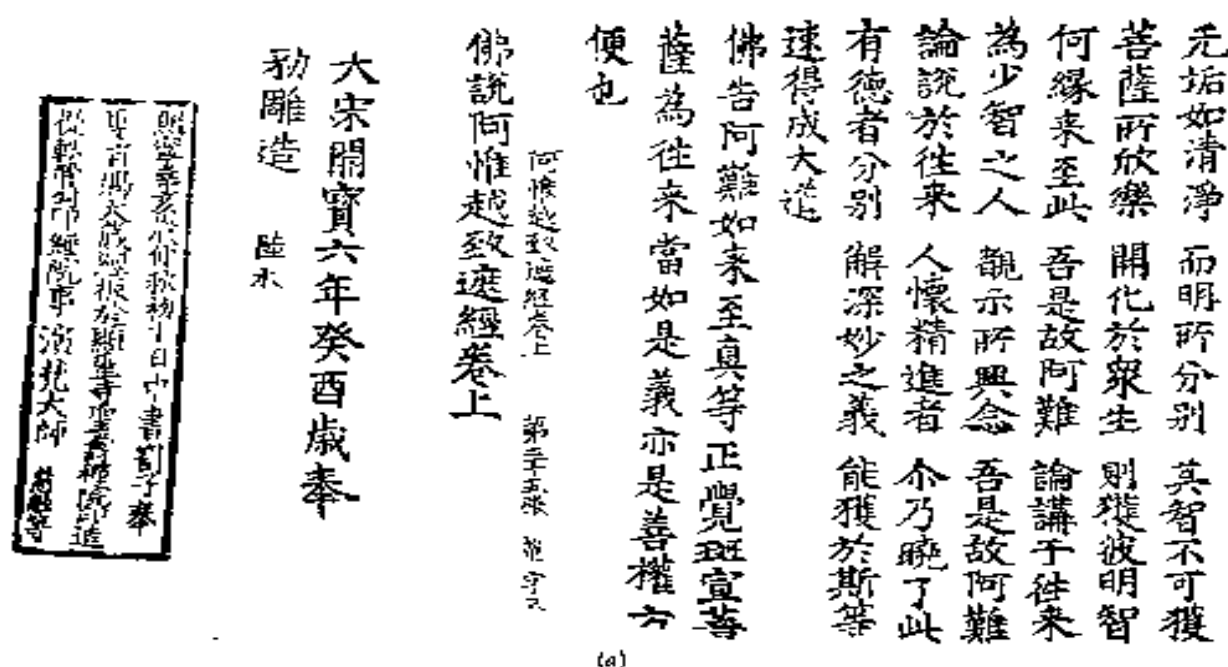
1. 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结尾部分。 约印于公元704-751年。1966年在南朝鲜发现。



2. 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的《金刚经》卷首扉画 画中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说法。



3. 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的《金剛經》卷末刊語 署有印造人王玠



4. 佛教大藏經的早期印本《開寶藏》 北宋開寶六年（公元973年）刻于成都，图中木刻牌子是后加的。

唵 娑摩訶 娑摩訶 娑摩訶

異體字彙新編

[illegible]

中國醫藥報社 中國醫藥報社 中國醫藥報社



夫役身現瑞并獲麟者乎哉嗚呼其可哀  
解脫爲大事因緣演教世出世間決生  
死入聖超凡自修自證由是鼓揚般若  
靈聖已闡涅槃大義無聞无扣向與姓

5. 最早的宋、明影印本《金剛經注》 明代葉正元  
 年（公元1341年）印。



原、明天正堂编印的《西畴新报》(十种丛书第1卷)中的一篇。印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

7. 清焦秉贞根据宋代绘画重绘的《耕织图》之一。图中描绘了插秧的场面，右上方是宋画中原有的题诗，天头上是康熙皇帝亲笔加题的御诗，公元1712年朱圭刻。



8. 清金简著《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书中绘制的制作木活字的“刻字图” 约绘制于公元1773年。

## 编者献辞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它曾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贡献，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财富。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曾对人类文化做过贡献，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它们多衰落了。只有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续性：首先，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



蒙、回、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的、不断的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其次,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至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

我们要继承、发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基本精神是指刚健自强的革新进取精神,注重道德教化,强调民族凝聚意识,以及重视历史智慧等几个主要方面。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了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广泛地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大计。要让中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

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即了解中国文化的辉煌历史与它的优良传统，从而给爱国主义打下稳固的思想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创造条件。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의初衷。

我们设计了历史、考古、地理、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典章制度、军事、经济、文艺、体育、生活习俗等方面的110个专题。希望这一套丛书从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如果海内外读者能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满足了。

对于本书的批评与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委会

1991年2月22日 北京

#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任继愈

副主编：冯钟芸 游铭钧 焦树安·

编 委（按姓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戴念祖	郭齐家	金宜久
李思敬	卢海燕·	谌桂明·
马樟根	欧阳中石	庞 朴
戚志芬	任雪芳·	沈心天·
谭其骧	汤一介	王世民
王兆睿	吴恩扬	吴 可·
吴良镛	严汝楠	张华炳
张明华·	张习孔·	赵 靖
赵匡华	钟磐惠	周 强
朱光潜		

（名后有·者为执行编委）

●责任编辑 / 刘连庚

●装帧设计 / 吕祥琪



##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出 版 提 要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作过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从历史、地理、思想、文化、教育、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文艺、体育与生活习俗等12个方面,分111个专题描述了上起远古、下迄新中国成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历史与概貌,阐述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以提高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观念,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ISBN 7—5328—1186—7 /

定价: 2.05元

# 目 录

一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	1
二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发展与衰落·····	9
1	雕版印刷的发明·····	9
2	唐代雕版印刷的兴起·····	17
3	五代雕版印刷的扩大·····	20
4	宋代雕版印刷的兴盛和辽金 西夏的印刷业·····	24
5	元代雕版印刷的萎缩·····	47
6	明代雕版印刷的继续发展·····	52
7	清代雕版印刷的衰落·····	64
三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74
1	宋代的活字印刷·····	74
2	元代的活字印刷·····	79
3	明代的活字印刷·····	85
4	清代的活字印刷·····	90
四	中国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101
1	印刷术传入亚洲各国·····	101
2	印刷术传入欧洲、非洲和美洲···	118

## 一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

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记载着丰富多采的发明创造，举世闻名的印刷术，就是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发明的。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特别是在造纸术尚未问世之前，缺乏轻便便宜的书写材料，文化知识的传播受到很大限制，因而读书学习非常困难。

大约距今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在陶器上刻画示意符号，这些符号由竖道、横道、斜道组成，约有二三十种，这可能就是中国原始文字的起源。试想，在陶器上刻画文字和阅读陶器文字，该有多大的困难！

到了3000多年前的商代后期，我国的文字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了。那时的文字大都刻在龟甲或兽骨上，后人称之为“甲骨文”。我们今天的汉字就是由甲骨文发展

来的。在可认识的汉字中，甲骨文是最古的文字体系，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字单字约在5000个以上，能够认识的约1700字。甲骨本身很笨重，并且多已破碎；甲骨文的形态和我们今天的文字差别很大，一般人几乎不能认识它；而且文字的内容都是关于占卜的记录。占就是占卦，卜就是问事，商王凡事必须通过占卦来决定。占卜的记录，叫做卜辞。卜辞用词简单，内容广泛，许多内容目前还不清楚。试想，在甲骨上刻写文字和阅读这种文字，该是何等不易！

大约从商代后期起，我们的祖先又开始在青铜器上刻字铸字。有的是在器物铸成后刻上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对器物的所有权；有的是在铸造器物时就铸上一篇纪念性短文，说明作器的原因、用途等。青铜器上的这种文字，一般称作“铭”（俗称金文）。铭文少的仅一二字，多的达几百字。象赫赫有名的商代“司母戊”大方鼎，在鼎腹的内壁上仅有“司母戊”三个字；西周晚期著名的毛公鼎，铭文多至497个字，为现存青铜器上最长的铭文。我们从发现的铭文里可以

学到许多历史知识。但是，青铜器是当时最珍贵的器物，多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一般人见不到；铭文的内容又过于简单，象“司母戊”三个字就有不同的解释；何况有的铭文象图画，很难辨认。试想，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和阅读铭文，也是难之又难！

大概也是在商朝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会用毛笔和墨在竹木简上写字了。竹木简就是细长的竹片或木片，每片长约一二尺，宽约半寸左右。每片多的写三四十个字，少的写七八个字。一个文件要用上几十片或几百片，一部书要用上千片。成百上千的竹木简，需要按顺序用麻绳把它们编连起来，麻绳容易断烂，所以有时用丝绳，叫做“丝编”，有时用熟皮带，叫做“韦编”。通常是先编后写。编串起来的竹木简，古时候叫册。册字古人写成“𦰩”，就象几片竹木简编连在一起的样子。通常一册是一篇完整的文字，所以又叫做“篇”。直到今天我们还沿用着册和篇的名字，只是册篇的概念有了一些变化。古人把写在竹木简上的书称做简册，有了简册，古人读书的条件就好多了。但是，



也有诸多不便。首先，读起来还是够麻烦的。竹木简不但翻动起来相当笨重，而且日子久了，翻动的次数多了，编串竹木简的绳子、皮带都还容易断，带子断了，简的次序一乱，就不容易读，要整理和重编又得花费许多时间。我国古代的大学问家大教育家孔子，他老年时用功研究《易经》，由于时常翻动，那竹木简的皮带就断了三次，这就是人们说的“韦（皮带）编三绝”的典故。由此可见读简册的困难了。其次简册体积大，分量重，携带很不方便。据说战国时候有个学问家惠施，他外出旅行常用五辆车装载着随带的书籍，所以后人称赞读书很多的人为“学富五车”。其实五车简册的内容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车书了。汉朝有个文学家叫东方朔，他写信给汉武帝献策献计，这封信一共用了3000多片竹简，要用两个人才抬得起来。汉武帝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看完。还有，东汉初年，光武帝把图书搬到洛阳，就用了2000多辆车去装运。这些事例说明简书携带起来实在太不方便了。简册有这样一些缺点，不仅给古人的学习带来困难，也对文化的传

播和发展十分不利。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写在丝织品上的书出现了。丝织品有缣、帛等名称，所以这种书就称做“缣书”、“帛书”。战国时期的《墨子》书里，有“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的记载，可见那时帛和竹木简已经同时并用了。汉代的著作里，更常用竹、帛二字表示记录，竹帛成了书籍或历史的代名词，成语“名留竹帛”就是名留史册。长幅的帛书总是卷起来收藏的，因此就有了“卷”的名称。古时“卷”和“篇”都是计算书籍数量的单位。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一部记录国家图书馆藏书的书籍目录，其中记录的书有用篇计算的，有用卷计算的，而用卷计算的不到用篇计算的一半。篇指简书，卷指帛书，这说明汉代的主要书写材料还是竹木简，帛书还不普及。很显然，竹木简比帛便宜得多，尽管没有帛轻便，但还得使用它。不过帛书到东汉时还是相当流行的。《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载，东汉末年，军阀董卓胁迫汉献帝从洛阳西迁长安，政府和宫廷的帛书遭到很大破坏，军人取帛书做成帷帐

车篷，制成袋子，可见当时帛书的数量是不小的。帛书柔软轻便，可随意折叠或卷起，阅读、携带、保存都很方便，它的出现和流行，为古人读书学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缣、帛价格太贵，一般人用不起，还不是普及文化的最好工具，于是，我们的祖先又想法研究新的书写材料了。这样，就有了纸的发明。

西汉时候，当人们还用竹帛写字时，就有了一种丝质的“絮纸”。纸字的左半边是“系”，就是因为原始的纸是用蚕丝纤维制成的。那种絮纸可能是漂洗绵絮的劳动妇女首先发明的，是她们从废料中检出残余的蚕丝纤维制出的副产品。由于原料来源有限，产量不多，絮纸并没有用作书写材料，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可贵的造纸方法。随后，劳动人民在制造絮纸经验的基础上，又制出了最早的植物纤维纸——麻质的纸。不过早期的麻纸很粗糙，还不足以代替缣帛和竹木简作为书写材料。到了东汉时期，宦官蔡伦总结了劳动人民的造纸经验，和有关工匠共同设计，利用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等废料，

从中提取植物纤维来制造纸张。公元105年，一种轻便便宜又能大量生产的植物纤维纸试制成功了，从此，造纸术流传各地，纸的应用也就推广开了。有了纸张，古人读书写字就有了良好的条件。到了魏晋时代，纸张逐渐取代了笨重的竹木简和昂贵的缣帛，纸写本书籍流行开来。但是，在书籍全靠抄写来流传的时期，古人读书还是相当困难的，文化的普及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一部长篇巨著，就得抄上几年甚至10几年的时间，不但耗费了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抄来抄去，容易发生错误和脱漏。一有抄错抄漏，往往把原书的意思都改了。一部宝贵的著作，假如只有一个或几个抄本，一旦遇到天灾人祸，这部好书就容易被毁灭掉。我国古代有不少有名的典籍因此没有保存下来，实在可惜得很。

从上文可以知道，陶器、甲骨、青铜器、竹木简和缣帛曾是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这些材料要么笨重得很，要么价钱很贵，这给古人读书写字带来很大困难。到了汉代，发明了纸，虽然轻便便宜，但又要全靠抄写把

书籍传播开来，人们才能读到书，学到文化知识。可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抄写的书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了，这就促使我们的祖先必须积极想办法，去探索寻求复制书籍的新方法，这样，雕版印刷术便发明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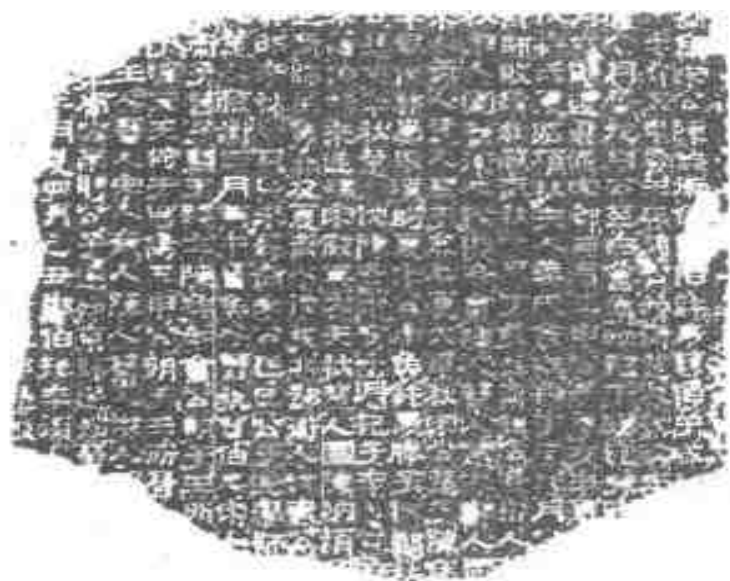
## 二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发展与衰落

### 1 雕版印刷的发明

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从古代的石碑和印章说起。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在石头上刻字。现存最早的刻石是秦国的石鼓，石鼓共有10个，每个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颂秦国国君游猎的情况。这套石鼓的绝对年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春秋初年秦文公所造。后来，人们把刻上了字的长方形大石块立在地上，这就有了石碑。最初的石碑，原是统治阶级自吹自擂的东西，例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巡游各地，就在名胜地方刻石立碑，宣扬自己的“功德”。当时的人民也用同样的方法表示对秦朝的不满，在大石块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

汉朝更盛行石刻。从汉武帝起，历代皇帝大多利用石碑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到了东汉末年，石碑成为重要典籍的标准本。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皇帝接受著名书法家蔡邕（yōng雍）的建议，把校正了



东汉《熹平石经·公羊传》经文残石  
刻于公元175—180年间。

的七种经典：《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全文刻在46块石碑上，立在洛阳太学门外，作为标准本供大家抄写和校对，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据说每天有成千的人前去抄写石碑上的经文，或拿了抄本去仔细校对，一时太学门外，车水马龙，拥挤得水洩不通。为了节省抄写的烦劳，尤其是免除抄错抄漏

的缺憾，我们的祖先又发明了拓（tà）碑的方法。最早的拓碑方法，是先在石碑上涂上墨，然后复上一张纸把字印下来；印出的碑文是黑底白字，但字是反的，读起来很不方便。后来改变了方法，先把纸浸湿了贴在碑上，用刷子在上面刷几遍，或者用布包着棉花在上面敲几遍，使碑文凹陷的笔划清楚地现在纸面，然后上墨，这样就拓出了正面的黑底白字，我们叫它做“拓本”，这种技术叫“拓石”，今天我们练字用的“碑帖”，大多数还是用这种方法拓印下来的。用石碑来印书，当然比抄书是方便多了，但是这种方法是很难普及的。平民百姓哪有能力在石碑上雕刻整部的书呢，因此，“拓石”的技术只能给发明印刷术以启迪，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对书籍的要求，于是我们的祖先又在寻求新的印书方法了。

大概在四五千年前，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就已经懂得了在陶器上使用压印的方法了。他们先制出刻着几何纹、水波纹、弦纹等花纹的陶印模，趁陶器坯尚未干燥时，就拿着印模印在器皿上，便成了印纹陶器。这



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印刷。到了战国时候，印章出现了。最初的印章是用铜制的，也有用金或银制的，秦始皇的印章“传国之宝”是用白玉雕成的。使用简牍<sup>①</sup>的时候，印章的用法和现在不同。那时候封发重要公文和私人信件，要在捆扎简牍的绳结处涂上粘土，这叫“封泥”，在封泥上再加盖印章作为封口的印记，这叫做“封”。古时不论公私信件所用木版通常是一尺长，所以叫做尺牍，后人把书信叫做“尺牍”，就是沿用了这个古名称。印章上的文字都是反字。有的是凹下去的阴文，有的是凸起来的阳文，印出来都成了正字。一般印章上刻字不多。汉代流行佩戴“刚卯”，这是一种用玉或桃木刻成的约三寸长的长形四方体的印，上面有孔，可以穿绳佩戴，四面皆有文字，其内容都是驱疫避鬼的迷信之辞，如刻上“莫我敢当”等字，字数约30多个。到了东晋时候，上山修道的道士身上佩戴一种枣木符印，在二寸见方的木块上已经刻着100多个字了，据说是用来

---

① 简牍：古人用长方形的薄木版写字，叫做版牍。简册版牍，统称简牍。

驱赶猛虎水怪的。那时候，纸的应用相当广了，印章的用法已经和现在大致相同。如果把木刻的符印蘸了颜色，印在纸上，那么只要盖印一次，就等于抄写100多字，真是方便多了。我们的祖先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想起把成部的书象刻图章一样刻在木版上，不是比在石碑上刻书容易得多么？于是，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人们就选择适于雕刻的梨木和枣木，锯成一块块方版，把誊清校定的底稿反着贴在木版上，按着每个字的笔划雕刻出凸起的阳文。整部的书版雕好后，就可以着手印刷。先用蘸了墨的刷子，在书版上刷一下，让版上凸出的反字都涂上墨，然后把白纸复上去，再用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取下来，一页白纸黑字的书印成了。就这样，从石碑、印章、符印逐渐演变，经过无数人的钻研改进，我们的祖先终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在我国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现在已经很难查考清楚了。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说法达几十种之多。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创始于唐朝。现

存最早的有年月可考的印刷品，是在敦煌发现的一卷首尾完整的《金刚经》。这卷佛经是用雕版印在七张纸上，粘连起来，全卷长约16尺，高1尺，卷首印着一幅木刻的佛教图画，绘着释迦牟尼在孤独圆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情形，四围诸天神佛环绕静听，神色肃穆，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平。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字。说明了这件印刷品是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有个叫王玠的人，为了替他的父母祈福消灾而出钱印成的，离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这卷《金刚经》墨色鲜明，刻镂精美，字体、图画和笔法都很纯熟，从雕版技术看，不象是初期的作品。可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一定比这卷佛经印成的时间早得多。可惜我国这部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插图的刻本，连同许多宝贵文物，已被英帝国主义盗走了，现在还存在伦敦博物馆里，这是令人切齿痛恨的。

这里需要指出，《金刚经》只是现存最早的有年月可考的印刷品，但并不是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现存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

品是《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是公元1966年在南朝鲜东南庆州佛国寺的一座石塔中发现的。庆州是古代新罗王国的都城，石塔建成于公元751年。这件木版印刷经卷，长约20尺，高约 $2\frac{1}{4}$ 寸，是用12块木雕版印在楮

（朝鲜语发音tak）纸上粘连而成，放在石塔内一个舍利瓶上的绸袋中。经卷上没有注明年份，但是经文中出现了几个武则天在位时期（公元684—704年）创造的新字，如证作鑿，地作埜，初作𪔐，授作𪔐；同时，经文是由中亚细亚古国吐火罗一个名叫弥陀仙的僧侣，在公元680—704年间寓居唐都长安时由梵文译出；佛国寺石塔又完工于751年，因而朝鲜学者考证，它是公元704—751年间刊印的。并且以武则天新字在新罗和日本很流行为理由，推断它是新罗自己雕印的。但是，多数中外学者认为，这卷经文是704年由弥陀仙译出后在中国印成的，很可能是在佛国寺建成时带往朝鲜作为贺礼的。它是8世纪初期唐朝的印本，而不是新罗的印本。这个印本的发现，也证明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

明时间，还要在这卷佛经问世之前。

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问世前后，唐朝文献中提到印刷的还有好几处。

《旧唐书·文宗纪》里说：“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原来在古代颁布历书是皇帝的特权，当时四川、江苏、安徽等地，每年在官历还没有颁发之前，民间私自印的历书已经布满天下了，这很有损于中央政府的威信，以致皇帝不得不下令禁止，这件事反映了文宗时候民间私印日历的盛行。

再有，著名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其中有“缮写模勒，衍（xuàn绚）卖于市井”这句话。一般认为“模勒”就是印刷。当时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深受人民喜爱，因此有人雕版印刷出来，到处叫卖。这件事发生在公元825年。

再往前，唐代有一部著作<sup>①</sup>中谈到，著名高僧玄奘于624到645年间访问印度，回国后，曾“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印数相当可观了。

<sup>①</sup> 见唐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国逸录》。

还有一条后出的史料，就是明朝享有盛名的史学家邵经邦，在他著的《弘简录》中说，唐太宗的长孙皇后，36岁死了，她著有《女则》10卷，唐太宗为了让“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梓行”就是雕版印行，这部书可说是最早的刻本，其时间大约在636年或稍后。

由此可知，雕版印刷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唐初贞观年间，只不过上面提到的印刷品都没有流传下来，还缺乏实物的证明。

## 2 唐代雕版印刷的兴起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公元618年建立，定都长安，907年灭亡，历时近300年。唐帝国疆域辽阔，经济发达，文化灿烂，在这个基础上，随着雕版印刷的发明，印刷业兴起了。

那时，印书的地点已逐渐遍及陕西、河南、四川、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区域相当广大，而长安和成都是当时刻书业的中心。在长安城的东市里已出现了民间书坊，如大刁家印的历书，李家印的医书都很有名。

李家印的《灸经》，是医书的最早印本。成都有印书铺，出版的书籍种类很多。如印历书的有樊赏家，今天还保存有882年樊赏家印的历书残页；印佛经的有龙池坊的卞家。1944年在成都唐墓中曾发现了9世纪后期卞家刻印的《陀罗尼经咒》，上面的中间和四周有小佛象，还有汉文和古梵文，雕印非常精细，墨色浓淡匀称，这是中文和梵文合刻的最早印本。同时，有个叫柳玘（pín频）的官吏，在他著的《柳氏家训》的序里说，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他在成都的书铺里看到许多印本书，有阴阳、占梦、看家宅之类的迷信书以及字典和小学生读物等，不过印得墨迹模糊，读起来“不可尽晓”，但是也说明成都刻书业的发达。

还有四川西部的西川过家，也印佛经。西川也出版有韵书和字书，公元865年，日本僧人宗睿由中国返回日本时，就携带了西川刻印的《唐韵》和《玉篇》以及佛经等书。

河南洛阳敬爱寺藏有佛经《毗尼藏》印本，后来可能在845年唐武宗敕毁全国佛寺时被毁，敬爱寺的和尚惠确，又重新刻印了

佛经，时间大约在869年以后。当时的文学家司空图还为他写了募化传单，向社会募化。

此外，江苏扬州、浙江绍兴也有雕版印刷。前面提到的元稹，曾在越州（今绍兴）做过官，他说越州、扬州一带，有许多人刻印他和白居易的诗作，在市场上出卖；有人还拿白居易诗集的印本换取酒茶喝；有人甚至盗用他们的姓名贩卖伪作。在扬州和苏州一带，民间私印历书的风气很盛行。在《唐语林》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末黄巢起义时，僖宗逃往四川，长江下游一带得不到官府的历书，于是那里的人民便自己刻印了历书出卖，没想到印卖历书的人竟因每月大小尽不同（农书，一个月30日为大尽，29日为小尽），发生了争执，被拘送到官府，糊涂的地方官对他们说：“你们同行做生意，差一天半天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把他们呵退了事。这件事反映了唐末长江下游一带民间印卖历书的盛行。

江西也刻印书籍。唐末有位江西观察使纆干泉，很迷信道家烧炼的什么龙虎丹，认为服用这些丹药可以“长生不死”，为此，



他在公元847到851年之间，雕印了讲求烧炼之术的《刘宏传》一书几千本，送给京城内外喜欢炼丹的同道，这是道教徒印书的最早记载。

由此可知，唐代印刷的地方已经相当广大了；印刷的内容也已经相当广泛了，甚至士大夫请客吃酒时玩的纸牌——叶子格和报纸，也可能有印刷品了。唐代的雕版印刷已初步兴起了。

### 3 五代雕版印刷的扩大

从公元907年到960年，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与此同时，南方各地和北方的山西也先后建立过10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的动乱时期，但是雕版印刷却日益扩大起来，雕版印刷的三大系统——官刻、家刻和坊刻开始形成了。

刻书地点以开封、成都、杭州为最有名。

公元932年，后唐宰相冯道首先倡导刻印儒家经典。据说他看到当时吴、蜀一带刻

印的书籍，虽然种类很多，但多是一般平民百姓所用的日历和一些通俗读物及佛经等，唯独没有儒家经典。于是他上书皇帝，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sup>①</sup>印版。得到皇帝批准后，由当时的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国子监（当时的大学）的“博士儒徒”，依照《唐石经》经文，仔细阅读校定，然后请书法高手以端楷写出，再组织人工雕刻印刷。从公元932年到953年，历时22年时间才全部完工。同时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辅助著作，共130册，这是官府大规模刻书的开始。这次刻印的九经，因为是国子监印本，后世称为《五代监本九经》，从此，版本学上出现了“监本”这个词。《监本九经》的问世，使古代经书有了统一的标准本，在当时还允许公开出卖，因而对于文化的普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政府对印刷业的提倡，士大夫私人

---

① 《九经》：实为十二经，即《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

刻书也多起来了。私家刻书世称“家刻本”。蜀国的京城成都，刻书业很兴盛。这里从唐末到宋初，7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因而经济发达，文化兴盛，这就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后蜀的宰相毋昭裔是私人大量刻印书籍的先驱。史书记载毋昭裔年少时，曾向别人借阅《文选》和《初学记》的抄本，人家不肯借给他，他十分气愤地发誓说：“他日得志，愿刻版印之，以便利天下的读书人。”后来他果然当了宰相，便叫人刻印了这两部书和其他著作，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他还自己出钱兴办学校，建议政府刻印《九经》，对蜀国文化的发展确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正因为如此，宋太祖灭后蜀时，许多在后蜀做过官的人都受到惩罚，并没收其家产，唯独对毋家网开一面，下令把雕版全部发还给毋家。他的子孙继续从事刻书事业，成为成都世代相继的有名的出版家。

吴越国的京城杭州，印刷业也相当发达。单是国王钱弘俶与和尚延寿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塔图、咒语，其中印数可考的

就达68万多卷，印数之大是空前的。而且印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印本不仅纸张洁白，墨色均匀，而且字体清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

著名词人和凝，曾在五代各朝做官，一直做到宰相的高位，他在自己的家乡山东出版过自己的集子100卷，他的作品流传到开封、洛阳一带。和凝是文学家出版自己作品的第一人。从此刻印私人文集的风气盛行起来。

还有南唐的京城金陵（今南京），刻印了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的《史通》。此外西北的敦煌、东南的福州都出版过书籍。

总之，五代的刻书事业在印刷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但是五代印本流传到今天的已经很少了，仅有的几种都是残本。《监本九经》更是一本也见不到了。

## 4 宋代雕版印刷的兴盛和 辽金西夏的印刷业

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宋代政府比较重视教育。中央有国子学、武学、律学、算学、医学等各类学校；地方上有郡学、府学、县学和书院、家塾、舍馆等。公元1093年，北宋的太学生人数就达3100多人；1203年，南宋报考太学的考生就多达37000人。可见宋代教育是相当发达的。由于教育的发展，需要的书籍量也大为增加，这就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同时，宋代纸墨的产量与质量都超过了前代，又为印刷业的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再加上宋政府本身又大力奖励刻书，象毋昭裔的后代毋克勤，就是因为捐献了《文选》、《初学记》的书版而做了官，毋家也因为刻印书籍发了财，据说家累千金。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宋代的雕版印刷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宋代的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和坊刻方面均有很大发展。

首先，宋代的各级政府都致力于刻书，象中央的国子监、国史院、秘书省（国家图书馆）等文化机构都出版了大批书籍，特别是国子监刻书最多。当时就有人说：“国子监之印群书，虽汉唐之盛无以加此。”北宋、南宋的监本书都多达110种。其中有儒家经典“十三经”<sup>①</sup>，正史“十七史”<sup>②</sup>，司马光主编的被称为史家绝作、大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大部类书《太平御览》<sup>③</sup>、《册府元龟》<sup>④</sup>，老子《道德经》

---

① “十三经”：即《五代监本九经》（实为十二经），加上1011年刻印的《孟子》，构成今天标准的“十三经”。

② “十七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这是首次官刻的历代正史。

③ 《太平御览》：原名《太平类编》，由李昉等14人编写，用了7年时间于983年编成。全书共1000卷，分55门，引用文献资料达1690种，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据说书写成后，进呈宋太宗，宋太宗每天阅览三卷，用了一年时间才读完，因此赐名《太平御览》。

④ 《册府元龟》：原名《历代君臣事迹》，由当时的宰相王钦若等15人编写，用了8年时间，于1013年编成。全书共1000卷，分31部，900多万字，引用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和“十七史”材料，是一部传记汇编。据说写成后，宋真宗亲自审阅，赐名《册府元龟》。

等书。其他政府机构刻印的，有六世纪的著名农书《齐民要术》，有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在内的《算经十书》，有医学著作《开宝本草》（因刻于宋太祖开宝年间，故名），还有许多有关历史、哲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诗歌文章以及佛教、道教的经典等书。官刻书籍除颁发各地作为官用外，还允许出卖作为政府的一项财政收入。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也仿照中央办法纷纷刻书，如两浙东路（今浙江东部）茶盐司公使库于公元1133年刻印了《资治通鉴》；福建路转运司于1147年重印了《太平圣惠方》<sup>①</sup>。此外地方各类学校也都有刻本。总之，宋代大小官府机关及文化机构刻书很多。

其次，宋代的士大夫们私人刻书的也很多。有刻印自己著作的，有刻印其祖先著作的，有刻印其师友著作的，有刻印其家藏善本的，有刻印名家著述的。这些私家刻书在

---

① 《太平圣惠方》：由王怀隐等编著，992年编成。记载了我国十世纪前的医药学成就，是宋代的医方巨著。

南宋时蔚然成风。许多著名版本就是私家刻印的。比较著名的有福建建溪三峰蔡梦弼，他刻了不少书，流传到今天的有刻于1171年的《史记集解索隐》、《三皇本纪》、《周本纪》等；还有建安黄善夫刻有《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前·后汉书》、《东坡诗》等；还有福建廖莹中的“世綵堂”，在南宋末年刻印了“九经三传”和唐代著名散文家韩愈的《昌黎先生集》及柳宗元的《河东先生集》，后者被认为是韩柳文集集中的标准印本，藏书家把它推为宋版书中的上品。这些私家所刻的书，一般都校勘严谨，刻印精美。

再者，就是坊刻。宋代坊刻在刻书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所刻之书，称为“坊刻本”。坊刻就是指一般书商设立的书坊，专门从事刻印书籍。他们刻印的书籍是以营利为目的。有些普通百姓还要靠刻书谋生，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倣，以取衣食”。许多城市中书坊林立，书坊拥有自己的写工、刻工和印工。宋代最有名的书坊要算福建建安余家的“万卷堂”和“勤有堂”。余家从北宋



末年起，世代刻书达600多年之久，刻印了大量的书籍，一直到明代余家的刻本依然名闻遐迩。甚至到了清代中期，余家还有人经营书坊，以致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下诏军机处：选派诚妥之员，善为访问，寻据复奏。余家书坊对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传世的万卷堂宋刻本中，有东汉经学家何休著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勤有堂有《古烈女传》。

南宋时，临安陈起的书籍铺也是很有名的。陈起，字宗之，号芸居，浙江钱塘人。他不仅是个出版商，而且多才多艺，能诗善画。他为人豪放豁达，结交了不少怀才不遇的江湖诗人，并对他们表示同情。为此，他编印了《江湖集》、《南宋六十家名贤小集》，使当时许多无名诗人的作品得以流传。他出版的书，不仅价格低，而且买书的可以赊欠，买不起的可以借看，所以他赢得了“文士独知音”的美名和“江湖名姓香”的声誉。他的书籍铺开设在临安棚北街，这一带书坊出版的书，藏书家称为“棚本”。他的儿子陈续芸也继承了父业，父子

相继经营书铺，一共出版了100多种著作，特别是刻印了大量诗选，唐宋两代著名诗人几乎无一遗漏。至今传于世的有唐朝的《周贺诗集》、《王建诗集》、《朱庆余诗集》、《唐女郎鱼玄机诗集》等，镌刻得都非常秀丽精湛，是陈家刻本中的代表作。

此外，还有临安尹家，建阳麻沙镇刘家，原居开封后迁临安的荣六郎家以及山西、江淮、湖广、四川等地的许多书坊，都刻了门类众多的书籍。

上述三种刻本，比较起来，官刻本在雕刻用料方面，不惜工本，印得精美大方；家刻本在校勘方面仔细认真；坊刻本为了多赚钱，力求节约工料，版排得行紧字密。宋代三种刻本流传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了，所以藏书家都十分珍视。

从上面可以看到，宋代刻书业是相当发达的。

宋代的刻书中心，主要有都城开封、临安和福建的建宁、建阳，四川的成都、眉山。

开封，是北宋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

城内除国子监大量刻书外，还有很多书铺，印卖书籍。相国寺东门大街一带，就是书坊的集中地，有的门前高挂“兑（悦）客书坊”的红边白布市招，有的还写上“发兑古今书籍”字样。逢到相国寺庙会，顾客熙熙攘攘，各种商贩喧嚷叫卖，车马行人来往不绝，热闹非凡。书商们也想尽办法推销书籍，有的用变相赌博兜售书籍；有的许诺只要“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以此招揽顾客。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沿河许多店铺间就有一家书铺，店主正在和顾客交谈。这些都反映了开封印刷业的兴旺。但是，1127年开封被金兵攻陷后，有不少书籍印版被当作战利品运往金的中都（今北京）；有些书铺相继南迁临安，书版也被运走，刻书业逐渐衰落。

公元1138年，南宋建都临安后，临安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北宋起，杭州就享有“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的声誉。这里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刻书业也很兴盛。刻印工不仅人数多，而且技术精湛，因此北宋政府出版的许多书籍，都要送到杭州

制版，很多监本书都是在杭州刻成的，甚至当时的高丽国也委托商人在杭州代刻佛经版。临安城内有书铺20多家，有的还开设分号。他们或刻印佛经、文选、史书，或刻印诗话唱本、小说异闻，或刻印有关娱乐游戏、迷信赌博的书，内容十分广泛。杭州版本刻印之精良，当时居全国印刷业之首。

福建北部的建阳与建宁府的建安县（今建瓯），附近多山，出产大量的竹木，刻版原料丰富；加上造纸工业发达，纸张供应充足，因此刻书业盛行，民间开设的书坊特别多，见于记载的有37家，称得上全国之冠。这里出版的书，称做“建本”。在《方輿胜览》里记载说，建宁府出版的书籍行销四方；建阳出版的书籍无远不至；建阳的麻沙、崇化两地书坊，号称“图书之府”。离麻沙镇20里左右，还有个“书林”，也是刻书集中地。由此可见，建阳、建宁刻书业是非常发达的。这里除了刻印经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诗文外，书坊主人还和当地文人合作，编辑刻印了一些适应科举考场需用的参考

书，这类考试用书是“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还编印了民间需要的医书、小说、酬世大全之类的书。总之，建本书，种类多，印量大，流传广，几乎遍及全国，有的还远销高丽和日本。但是，在质量上它赶不上杭州和成都的版本。

四川的成都和眉山也是刻书业的集中地。成都在唐宋已有书铺出卖各种印本书，五代后蜀又大力提倡刻书，因此刻书业经久不衰。到了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政府派人到成都雕刻《大藏（zàng）经》版，历时12年才全部完工。共刻版13万块，5048卷。后来把这些经版运到了开封，印成卷轴形式出版。因为这部书开始雕刻于开宝年，所以又称《开宝藏》；又因为是在成都刻的，故又称《蜀藏》。雕刻这样一部规模宏伟的佛教大丛书——《大藏经》，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它是国内外各种《佛藏》的祖版。当时曾把它送给朝鲜、日本、越南和国内少数民族，对他们的印刷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惜现在已无全本传世了。到了南宋时期，四川刻书业逐渐向眉山发展，这里刻印

有“眉山七史”<sup>①</sup>和唐宋名家著作，如李白、李贺、孟郊、刘禹锡等人的诗歌；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和秦观等人的散文以及医书等。四川刻本，通称“蜀本”。蜀本纸张洁白，校勘精细，可与杭州本比美，只是流传至今的蜀本也很少了。

宋代刻书地点很多，除上述几个中心地区外，江西、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地也有质量很高的刻本书，连偏僻边远的海南岛也刻了医书。据记载北宋刻书地点仅30多处，而南宋时已达200多处，刻书业几乎遍及南宋全境。

总之，宋朝刻书业最盛行，最普遍，不愧为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所刻之书，数量既多，质量又高，字体优美，纸墨精良，装订考究，校勘严谨不苟，版式疏朗悦目，在书写艺术和刻印技巧上都达到了成熟的境地。因此，宋本书成为一种很珍贵的版本，为历代收藏家所宝爱。宋本书在当时可能有几万部，而今天收藏在国内外图书馆

---

① “眉山七史”：1144年井宪孟所刻，即宋、齐、梁、陈、魏、北齐、北周七书。

的已不到1000部了，而且多是残本和复本。虽然如此，一部分古代作品还是靠宋代印本流传下来了，所以宋代印刷业对于保存我国古代文化是有很大功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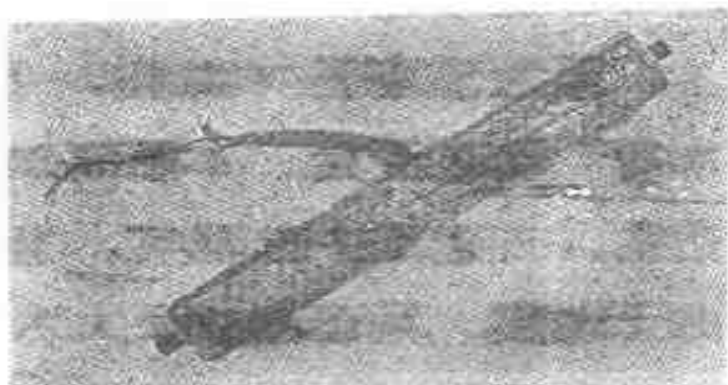
宋代的雕版印刷也推广到当时的辽、金和西夏。

辽建国后，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创造了以汉文为基础的契丹文字，代替木刻记事。后来从北宋输入了大量印本书，逐渐掌握了雕版印刷技术，开始自己刻印书籍。辽代的出版中心在南京，或称燕京（今北京），燕京设有印经院，还有私人书坊，都刻印过一些书籍，最著名的要算11世纪刻印的汉文大藏经《契丹藏》（也称《辽藏》），这是根据宋代的《开宝藏》翻刻的，有大小两种字体版本。大字本共5000多卷，是卷轴本，卷首还有精美的扉画佛像。小字本，纸薄字密，刻镂精巧，是不满1000册的小本。《契丹藏》出版后，曾赠送给高丽王室几部，国内各地寺庙也有储藏，不过小字本迄今尚未发现，今天留存的只有大字本残卷了，这是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的。

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因为该塔是木结构，所以它以“应县木塔”闻名于世。木塔高20丈，雄伟宏丽，是我国古建筑中的瑰宝。但是900多年来，由于地震、风雨剥蚀及人为灾害的影响，塔身已经变形；十年动乱之初，塔内塑像又遭到破坏。因此，从1974年起，国家文物局对木塔进行了抢险维修，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极其珍贵的辽代文物。其中单是刻印的佛经就有40多件，其它刻书、杂刻和版刻印刷佛象10多件，还有佛经抄写本等，内容十分丰富。这批文物因为年代久远，屡经鼠患，部分经卷画幅已经残断折裂，有的撕成碎片，有的糜烂成团，后经文物部门的校核拼对，装裱修复，终于使这批残破不堪的经卷古籍，整旧如旧，始得再现于世。

在这次发现的辽代刻印的佛经中，有《契丹藏》12卷，但大多是残卷。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雕版大藏经，自北宋以来历代各朝或多或少都有传世之本，唯独《契丹藏》未见流传，多年以来，国内外学者深以为憾事。这次《契丹藏》的发现，已填补了我国





辽代首创的木刻印刷书签《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四十七垂》公元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书签中的“垂”字是《契丹藏》经卷中的千字文编号。

印刷史上的空白。

这次发现的《契丹藏》12卷，包括《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花经》、《称赞大乘功德经》、《大法炬陀罗尼经》等。每卷经文都需要雕刻几块甚至几十块版，每一卷都是由几张或几十张纸粘连而成。每卷都用千字文<sup>①</sup>编号，卷首多有精致的扉画佛像，每卷均有译者姓名，皆是大字楷书。字体工整有力，行格疏朗，排列整齐，版式统一，纸质优良，印刷精美。各卷都未见虫蛀，足

---

① 《千字文》：是中国古代的蒙学课本，南朝周兴嗣撰。该书拓取王羲之遗书不同的字1000个，编成四言韵语，叙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使用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

见当时防蠹技术水平之高。全部为卷轴装，用圆木轴，竹制杆，丝织缥带，卷成一卷后，贴上印好的书签，再用缥带捆起来收藏。印刷书签是辽代的首创，《契丹藏》是最早使用的。

《契丹藏》的雕刻，大约始于辽圣宗统和年间（公元983—1101年），而完成于辽兴宗重熙年间（公元1032—1054年），它是仅晚于《开宝藏》而早于国内其它任何木刻大藏经。它与北京西南房山县云居寺保存的石刻本《契丹藏》比较，在经名、译者和千字文编号方面都一一吻合，这进一步证明了木刻《契丹藏》的真实性。

木塔发现的其它刻经与杂刻印刷品，根据经卷卷尾题记，最早始于统和八年（公元990年），最晚止于辽天祚帝天庆年间（公元1111—1120年），前后绵延130年之久。在这批雕版印刷品中，有一本目前世所仅有的辽版书籍《蒙求》，这是该书现存的最早刻本。这本书是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是千余年来流传广泛的著名儿童读物，编者是唐代李翰。该书以历史典故为主要内

容，采用对偶押韵的句子，每句四字，每句包含一个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的故事，上下两句成为对偶。它既可帮助儿童认识《千字文》以外的生字，又可以学些历史知识，正所谓“不出卷而知天下”。因此，它比以认字为主的蒙书前进了一大步，在蒙学史上可与《千字文》前后辉映，对以后的蒙书具有极大的影响。

此外，木塔秘藏的辽代木刻版画共有六幅，其中三幅是印在绢上的，象《南无释迦牟尼佛象》就是大型彩色绢画，画面刻画了释迦牟尼佛扶膝端坐在莲台向弟子说法的情景，释迦身披红色衣，头部绕以红蓝光圈，顶部华盖帛幔下垂，华盖两旁饰以天草；佛前有四众肃立，另有供养人、化生童子。画面结构繁复，布局紧凑。两旁印有“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其印制方法可能属于丝漏印刷，似是用两套版印制，先漏印红色，后漏印蓝色，字底上的黄色则是用笔刷染的，这和我国民间镂孔印染花布的方法基本相同。三幅佛画都是先用同一套版印刷人形、物状的轮廓，而后用墨笔勾画人物的面部五

官及手足。因为只制了半幅画的漏版，印时将绢对折，使颜色浸过两层绢素，再打开成为整幅，这样，画面上的人物、图案、字迹左右对称，而“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就出现了左为反文，右为正文的情况，对折处也留下了一条污色。这三幅辽代彩色佛画，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虽然不是印在纸上，而是绢布，但在我国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有两幅《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版画，画面刻画了药师佛<sup>①</sup>向胁侍及十二药叉神将说法的盛大场面。但木刻粗糙，设色简单。还有一幅《炽盛光九曜图》版画，正面为炽盛光佛坐在须弥座莲台之上，人形化的“九曜”星宿环佛而立，似在聆听教义。刻工精细，线条遒劲圆润，是我国古代木刻中的优秀作品，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立幅版印着色佛教画幅。

这三幅佛教故事画，都是印在白麻纸

---

① 药师佛：即药师琉璃光佛，又名大医王佛。传说居东方净土，曾发十二誓愿，救众生之病源，疗治无名痼疾，是古代民间崇拜的一个重要偶像。

上，在雕版印刷后，再着颜色。它反映了辽代民间画工之功力和木刻版画之精致。

上述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和大部分刻书、刻经与版印佛画，都是在辽都燕京印刷的，这说明了当时的燕京，不仅是北方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在雕版印刷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

辽代还刻印了汉文《五经传疏》、《史记》、《汉书》、苏东坡的诗集《大苏小集》、辽僧行均著的字书《龙龕手镜》和晋朝葛洪著的医书《肘后方》<sup>①</sup>等。并且还把一些汉文书籍译成契丹文印刷出版，如白居易的《讽谏集》，唐史学家吴兢的《贞观政要》<sup>②</sup>，还有《五代史》、《通历》等史书，

---

① 《肘后方》：原名《肘后备急方》。该书记载内、外、妇、儿、眼各科疾病的治疗方药，多为民间常用的单方、验方，多取易得之药，药味简单，便于采用。反映了公元3世纪我国的医学成就。因该书卷帙不多，可悬肘后，故名。

② 《贞观政要》：该书记录了唐太宗的治国经验，收有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争议和所上劝谏的奏疏以及政治上的设施。向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成为他们必读的政治教材。

而这些译本也都早已失传了，所以辽代刻书流传下来的极少。

金的刻书事业也相当发达。刻书中心有燕京、汴京和山西平阳、河北宁晋等地。金国统治者在撤离燕京时，仅载运内府的书籍，就用了三万辆车子，可见金代书籍、文物之多。那时，汴京相国寺，仍承袭北宋民俗，每月定期举行庙会，庙会上也出卖书籍。金世宗的孙子完颜珣（shú赎），晚年刻印了自己的诗作《如庵小藁（gǎo搞）》，汴京各书铺多有出售。政府和平阳府（治所在今临汾市）设立经籍所（相当后来的官书局），专门出版书籍。当地出产白麻纸，北边的太原府又有造墨场，纸墨取材都比较方便，所以平阳府也是出版商汇集之地，有许多书坊刻印了不少书籍，著名的有平水（平阳府城的别称）王文郁刻印的《经史证类本草》和《新刊韵略》<sup>①</sup>，李子文刊印的王朋寿增修类书《增广分门类林杂说》，王敏仲校刊的

---

① 《韵略》：宋丘雍等编，是供科举考试之用的韵书，因是《广韵》一书的略本，故称《韵略》。今已不传。

《尚书注疏》，张存惠刻印的《通鉴节要》；还有平阳姬家刻印的《四美图》版画，上面绘刻着历史上四位美人：西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居中，与西晋石崇爱妾绿珠同在前列，王昭君与班姬（即班昭）同在后面。画中还配以栏杆、假山和牡丹。上刻横标题“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下落款“平阳姬家雕印”。人物生动活泼，刻工细致，是平阳坊刻本的代表作。现存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博物馆。因为平阳是当时公私出版业的中心，读书人又多，所以许多人家“家置书楼，人蓄文库”。河北宁晋荆家出版的书籍精美价廉，销路很广，可惜宁晋刻本今已罕见。今北京图书馆藏有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韩道昭撰的韵书《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即是荆家刻印。其它地方从事刻书的也不少，金代十九路中有刻书地名可考的达九路30处之多，几乎遍及今天的华北地区。许多地方刻书蔚然成风：有的人家家境并不宽裕，象济南李德元以教书为生，竟不惜出利借贷刻印书籍；有人购得南宋国史院编修馆胡铨著的《劾秦桧疏稿》刻印出卖，获利甚多；有人还在宋

金两国边界贸易之地榷场<sup>①</sup>刊印书籍出卖，小学教师王鼎自己无钱，特请朋友帮助，刊印了北宋名医成无己著的《伤寒论注解》，这是张仲景《伤寒论》的最早注本，被称为“万全之书”；还有许多地方大量印卖看风水的《地理新书》，这是金代版本最多的书。但是，金代的官刻和家刻刻印最多的还是经、史、文集，坊刻最多的是民间所需要的医书、类书、字书、韵书和说唱文学。

金代刻书有书名可考的约有100多种，其中最有名而又工程最大的是佛教经典《金藏》和道教经典《道藏》。

《金藏》就是在山西解州（今运城县）刻的《大藏经》，这部书原藏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内，所以又叫《赵城藏》。大约公元1148年开始雕版，至1173年刻成，1178年出版，前后历时30年。据说首先发起刻这部藏经的是一个名叫崔法珍的女子，她苦心学佛，把胳膊断下来募集刻经的款项，这事感动了许多包括汉人、女真人、蒙古人在内的

---

① 榷场：宋、辽、夏、金时期，政府在边境上设立的收税贸易市场。



善男信女，他们纷纷捐献钱财、物品、牲口，而后由解州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主持雕刻，所以这部藏经是由民间发起依靠广大信徒集资刻印而成的。这部藏经汇集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到金代以前在中国流行的各种佛教的经论和著述。原书可能有7000多卷，到公元1934年发现时，只剩下4900多卷了。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抢走这部佛经，中国共产党赵城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研究抢救措施。当时还不知佛经藏在何处，经派人查访，才得知藏在广胜寺飞虹塔的二层上。在力空和尚的配合下，由广胜寺附近村庄的抗日村干部，动员了一些身强力壮的抗日群众，以“运公粮”为名，在游击队和八路军战士的掩护下，用箩筐担挑连夜抢运到太岳军区。这部《金藏》得救了，但是有几位战士却为此而光荣牺牲了。解放后，把这部佛经移交给了北京图书馆收藏。由于天长日久，保护不当，许多经卷受潮霉烂，损坏严重，虽经装订工人的精心修补，如今也只剩下4300多卷了。这部书是卷轴装，是我国仅存的一部孤本佛经。

金代在公元1188—1191年间，在中都刻印的《大金玄都宝藏》，也多达6400多卷，是最完备的《道藏经》，其内容之丰富，工程之浩大，可与《金藏》媲美。

此外，金朝统治者为了使女真人“知仁义道德”，还把许多汉文经史典籍，译成女真文字刻印出版，其中著名的有《尚书》、《易经》、《春秋》、《论语》、《史记》、《西汉书》、《贞观政要》、白居易的《白氏策林》等书。这些书的印数，想来也相当可观，象《孝经》一书刊印后，金世宗一次就分赐给护卫亲军上千部，可见为数不少。不过，这些译本今天已无一本流传下来。

西夏统治者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和印刷事业。元昊本人通汉语，喜欢汉文书籍，他建立学校，创制西夏文字，命人翻译《孝经》和《尔雅》。他的后继者仿照宋朝建立太学和各级学校，实行科举考试；向宋朝求得许多监本书，又向金朝购买儒家书籍和佛经。由于教育的发展，印刷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政府在都城兴庆（今宁夏银川）设有官营纸工院和刻印司，专门造纸和刻印书籍。西夏

刻汉文本很少，刻印最多的是西夏文著作和汉文典籍的西夏文译本，共约30多种，其中不少刻本还流传至今。西夏文本中有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格言集《圣立义海》、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和《西夏诗集》以及佛教劝善的诗文等。汉籍西夏文译本有《贞观政要》的节译本，有包括《列子》、《左传》、《孔子家语》在内的《汉文典籍择译》，有史书《十二国》和兵书《孙子兵法》、《三略》、《六韬》<sup>①</sup>等军事经典著作。为了“和番汉之众，增二国之谊”，还在公元1190年出版了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以便西夏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此外，西夏与辽、金一样崇尚佛教，多次用马匹向宋朝换取佛经，并翻译成西夏文《大藏》。国王王后为祈求所谓福利，常大量印施佛经，一次印数多至5万卷或10万卷。可惜许多流传下来的西夏文

---

① 《三略》：相传为汉初黄石公所作，故又名《黄石公三略》，全书分上略、中略、下略三卷。《六韬》：相传为西周吕望（姜太公）所作，近人研究可能是战国时的作品，六韬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

印本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被俄英帝国主义分子盗走了。

特别值得珍视的，元朝时，西夏的刻字工人到江南去刻书，献身于沟通文化的事业，体现了汉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 5 元代雕版印刷的萎缩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承了汗位，随后定都大都（今北京），1271年改国号为元。

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低下，当时处于“九儒十丐”的境地。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防范，对著作的出版严加限制；再加上生产遭到破坏，纸墨产量不多，因此印刷业呈现萎缩之势。

元代刻书，也有官刻、家刻和坊刻。刻书地点有大都、平阳、杭州、建宁、吐鲁蕃等地。

元代官刻，在中央有兴文署、广成局、国子监、太医院。不过刻书不多，其中最早最著名的刻本，是1290年兴文署刻的《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和《通鉴释文辨误》。地

方上刻书最多的是各级政府设立的儒学，刻了不少经史典籍，如浙西路儒学刻的11种经书，建康等9路刻的9种史书，都是比较著名的。还有各地的书院也都刻书。主持书院的“山长”（校长）大都是著名的学者，所刻书籍都非常精美，如杭州西湖书院刻的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是元本中的代表作。西湖书院有学田收入，经费充足，曾经修补了宋朝国子监的书版，共约有120种左右，是书院刻书的最大工程。

官刻书因为由官家出资，大都不惜工本，选用能工巧匠和上等纸墨，所以一般刻印精良。

私家刻书最有名的，有江苏吴兴的岳家，刻有《春秋经传集解》，据说还刻了许多经书，号称“岳氏九经”。还有平水（今山西临汾）曹家刻的金代文学家元好问编的诗集《中州集》和《中州乐府》；山东东平丁思敬刻的北宋散文家曾巩的诗文集《元丰类稿》；江西吉安王常刻的《王荆公（王安石）诗笺注》等。这些书今天都有传本。私家刻

书，校勘都很认真，其中有不少是精品。

元代书坊之多不亚于宋代。福建建宁路的建安、建阳两县，见于记载的书坊已有42家。其中余志安的勤有堂、刘锦文的日新堂、叶日增的广勤堂和虞平斋的务本堂都是著名的书坊，都刻印了很多书籍。前两家每家都刻印了20种著作。勤有堂刻了元代苏天爵著的《国朝名臣事略》和元代学者虞集（字伯生）的诗集《伯生诗续编》。广勤堂刻了我国古代的脉学专著《王氏脉经》<sup>①</sup>。务本堂刻了元代著名大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的诗集《赵子昂诗集》。这些书今天也都有传本。

此外，大都窦桂芳的活济堂，精于刻印医书；平阳张家的晦明轩和王家的中和轩都是金元两代的老书坊。他们刻印了宋人著的药理学著作《证类本草》和用于写作韵文的字典《韵略》等书。杭州的书坊刻印了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的《单刀会》、尚仲贤的

---

① 《脉经》：魏晋间王叔和著，王做过晋朝太医令，他在该书中第一次将脉象分为24种，基本上包括了循环生理上所有的现象。

《三夺槊》、王伯成的《贬夜郎》等著作。

这些书坊所刻书籍，也多请名家校订，刻印量大，流传最广，对文化的传播起了不小的作用。

元代还继续刻印佛教道教经典，如佛教《大藏经》在吐鲁蕃就有汉文、蒙文、藏文、西夏文、维吾尔文、梵文等六种文字的刻本。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公元1244年蒙古就刻印了《道藏》7800卷。此外，还印了大量的纸币，由于发行额太大，造成通货膨胀，以致最后人民拒绝使用。

总观元代印刷业，虽然继承了宋、金的传统，刻印了很多书籍，但是出版的数量远远比不上宋朝，质量上也赶不上宋代的精美，纸墨的生产比不上宋、金。所以印刷业和宋代相比，是处于萎缩时期。但是也有创新，如朱墨两色套印的发明，书名页（封面）的出现，都是印刷史上的创举。

元代的套色印刷（通称“套版”），最初是朱墨两色，这是由以往朱墨两色写本中发展来的。流传到现在最早的套印本，是元末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中兴路（今湖北

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注解的《金刚经注》。卷首扉画画着一个老僧正坐在松树下的书案旁讲经，还有侍童一人，旁立一人，桌前地面上生出几枝灵芝草，天空中还有云彩飞绕。画中松树用黑色，其它用红色。经文、注文亦用朱墨两色套印。这本《金刚经注》，解放前收藏在南京图书馆，今天保存在台湾。套印的发明，是印刷上的大事，以往的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都是单色的白纸黑字，至此有了两色。开卷朱、墨分明，一目了然，只是这一新发明在当时没有广泛应用。

元代以前的书籍没有书名页，象宋版书最多是在每卷卷端题署书名，或在版心刻书名简称，没有封面。到了十三世纪末才出现了书名页。元英宗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建安虞氏出版了《武王伐纣书》、《秦并六国》、《三国志》等五种平话，这些书都有带图画的封面，如《三国志》整个封面上，最上端印有“建安虞氏新刊”的横批，其下是“三顾茅庐”图画一幅，再下是《新全相三国志平话》的书名，八个特大字双行



排印，十分醒目，中间有“至治新刊”四字，字体较小，表明该书刊印的时间。书名标出“新全相”，是指新加上的人物像图画，目的是以广招徕。书分上下栏，上图下文，展卷阅读，引人入胜。普通书名页不带图，象公元1356年刘君佐的“翠岩精舍”刻印的《广韵》，封面上只印有“新刊足注明本广韵”，八个大字，双行排印。其上标明“校正无误”，两旁印上“五音四声切韵图谱详明”，“至正丙申仲夏绣梓印行”。不带图画。书名题署“明本”是指出版家依据的是明州（今浙江宁波）版本重刻。该书是宋代陈彭年等人奉诏重修的，是汉语音韵学中一部重要韵书。版本有官刻本，注文完整；有坊刻本，注文简略。

书名页的出现，给读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实在是印刷史上的一大进步。

## 6 明代雕版印刷的继续发展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建都应天（今南京），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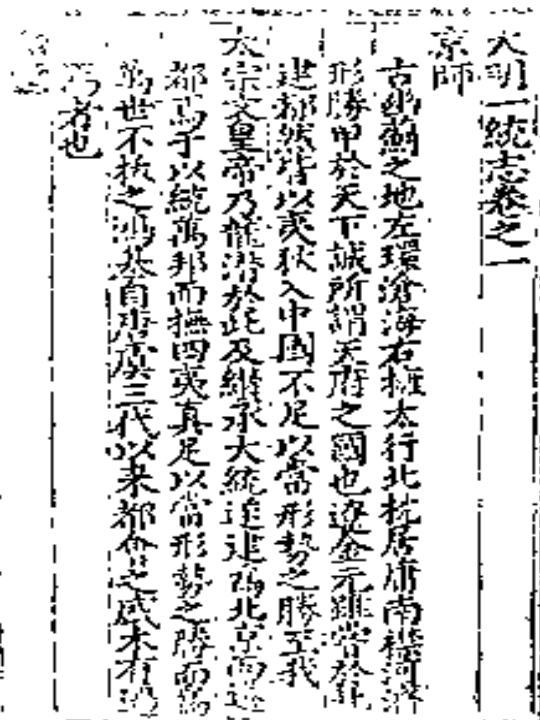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也是当时世界上统一

而又富强的的大帝国。明初统治者一开始就采取偃武修文的政策，十分重视图书的收集和出版，朱元璋就曾下令将元代西湖书院所有宋、元版片，全部运往南京，存于国子监；朱棣也曾遣使访购古今图书，因此刻书业发达。

明代的官刻部门很多。首先有“内府”，即在皇帝宫廷内刻印图书，主持内府刻书的机构是司礼监，所刻书籍称做“内府本”。后来司礼监扩大了机构，设立了经厂，经厂开始刻印图书，所刻书籍称做“经厂本”。

这些官刻本，讲究精写精刻，但校勘不细，错误颇多，学术价值不高。刻印的内容多是作为“标准本”的四书五经和明政府的政令政典，如公元

1461年出版了明帝国的官方志书《大明一统志》，1511年出版的法规汇编《大明会典》等。但是中央刻书最多的机构，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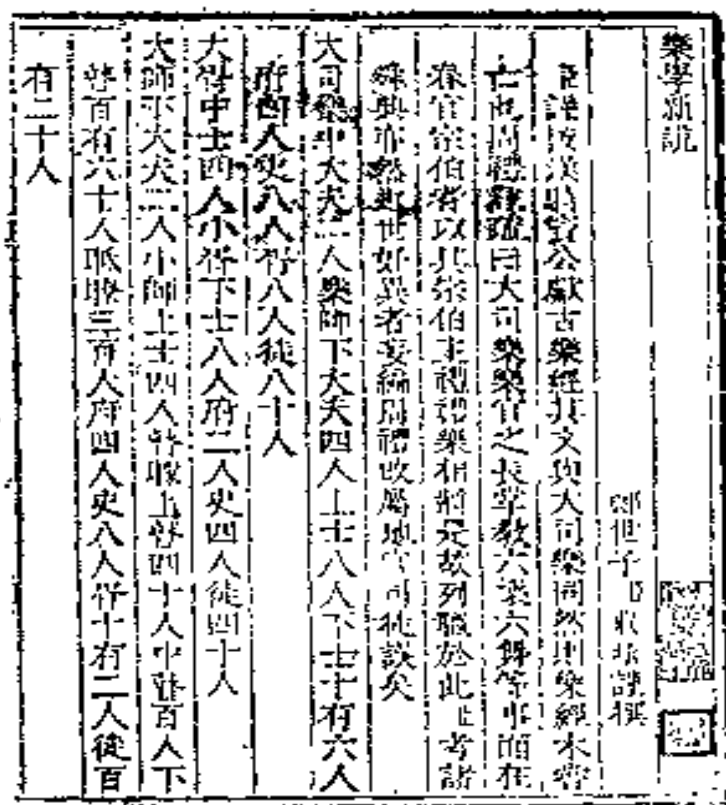


明代内府本《大明一统志》印于公元1461年。

要数南京、北京两个国子监了（简称南监、北监）。两监刻印了不下300种经、史、地方志、法帖、类书及医学、农业、科技书籍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十三经”、“二十一史”。此外，两京部院（礼部、兵部、工部、都察院、太医院、钦天监等）也刻了不少书。礼部编印了有关赐谥的书《大礼集义》；兵部刻印了论述北方边防并附有地图说明的《九边图说》；钦天监（掌管天象历法的官署）刻印了《大统历日》；北京都察院还刻印了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关于奕棋、音乐歌曲的书。

官府刻书，除中央机构外，地方上十三布政司、按察司、少数盐运司及各府也都刻书。在各地官刻本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以皇子身份分封到外地的藩王，他们既富有钱财，又有闲散精力，还拥有搜集善本和组织刻印的便利条件。因此，藩王府的刻本，以版本最佳、刻印俱优、校勘精当、纸墨上乘著称于世。象公元1534年秦藩朱惟焯（zhuó 卓）在封地西安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公元1606年前后郑藩朱载堉（yù 育）刻的音乐

著作《乐律全书》，都刻印极精，可以说是



明刻本《乐律全书》约刻于公元1606年  
藩本中的代表作。明代藩王府刻本多达430  
种，比南北监本还多。

明代私家刻书的也不少，特别是嘉靖以  
后，更是盛极一时。那时，许多士大夫以刻  
书为荣，有的刻印古籍秘本，有的刻印名家  
诗文，有的刻印宣扬祖德的家集。象公元  
1525年江苏王延哲刻的《史记》，就是依据  
宋朝黄善夫的刻本，刻工精美，是《史记》  
复宋本的最佳本。公元1535年苏州袁褧(jiǒng  
炯)复刻的宋本古小说集《世说新语》也是

精美绝伦。到了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刻书业更为繁荣。象安徽歙（shè射）县的吴勉学刻印了经、史、子、集100多种；浙江钱塘的胡文焕也刻了很多的书，而最有名的刻书家与藏书家则是崇祯时候的毛晋了。

毛晋（公元1599—1659年），江苏常熟人，喜欢读书藏书，他专门购求宋元刻的珍本书，他曾在自己门口贴上一张广告：

有以宋槧（qiǎn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这样，湖州一带的贩书商人，满载着一船船的古籍，送到毛晋的家门口。当时常熟流行着一句谚语：“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yù育）书于毛氏。”毛晋收藏的书达84000册，有“海内藏书第一家”之称。他建造了一座汲古阁目耕楼，将书藏在里面，其中多为宋代刻本，这就为他大规模校勘、出版书籍创造了条件。

他大约从30岁左右起，就开始经营出版业，一直到他去世，40多年先后刻书600多

种，其数量之大，为历代私家刻书之冠。他刻的书大多用宋本作底本，每本都有他写的跋语，介绍书的作者或编者，说明过去有哪些版本流传，他用的是什么版本，有什么优点。因此，他刻的书很受人欢迎，不但流行大江南北，连云南也远道来采购，“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他校刻的“十三经”和“十七史”，开始于公元1628年，中间经过灾荒战乱，书版被“水火虫鼠，十伤二三”，他不断地“收其放失，补其遗亡”，直到清初1656年才完工，前后历时近30年，真是艰难之极。他还刻印了自己编辑的大部丛书《津逮秘书》共15集，140多种书，该丛书所辑多宋元人著作，偏重掌故琐记。他印刷用的纸张，是江西造纸厂特造的“毛边纸”，今天我们还沿用着这个名词。

毛晋苦心经营出版事业，四十年如一日，他自己说：“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迄今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因此，被人誉为“典籍印刷之忠臣”。许多宋代刻本，靠他翻刻得以流传下来，他对于古代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做出了重大贡

献。

明代私家刻书虽不乏精品，但粗制滥造者也不少，“书帕本”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明代官场行贿之风极盛，行贿时，必以新刻书一本和手帕一块作陪衬。比如京官奉使出差，回京时必须刻一书，以一书一帕为馈赠礼品，这样才显得雅致些。新书的序文上堂而皇之地说，捐俸绣梓，用广流传。其实新刻书用的是公款，谈不上“捐俸”；所刻之书，本子狭小，刻工拙劣，校勘粗疏；有的书内容是东抄西袭，胡拼乱凑，又哪里说得上用广流传。就是这些书被人称做“书帕本”。

上面所谈官刻、家刻之书，虽然不少，但多是经史典籍和名家诗文，而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小说、戏曲、识字课本、酬世便览、百科全书之类的民间读物却不很多，于是坊刻本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明代书坊多集中于南京、建阳、杭州、北京等地。

南京有书坊90多家，居全国书坊之首。它们刻印了大量的戏曲、小说、传奇和民间

应用类书。其中唐对溪的富春堂刻印的戏曲，据说就有百种之多，如《三顾草庐记》、《岳飞破虏东窗记》、《王昭君出塞和戎记》、《管鲍分金记》等，这些书的版框四周有花纹图案，称为“花栏”，打破了宋元以来传统的单边、双边的单调。陈大来的继志斋也刻有戏曲10多种，如元人作品《黄粱梦记》、明人作品《玉簪记》和《旗亭记》等。各书坊所刻戏曲总数可能有二三百种。各书坊刻印的小说有《三国志演义》、《西游记》、《警世通言》、《隋炀帝艳史》等；刻印的应用类书有《针灸大成》、《医方选要》、《尺牍大全》、《字汇》等。这些书大部分带有插图，销路很广，对活跃当时人民的文化生活起了一定的作用。

建阳书坊（自称“书林”），有堂号姓名可考的约有80多家。许多书坊历史悠久，刻书很多。不过，万历以前，所刻书籍多是经史之类。到了万历年间，刻印的民间读物日渐增多。建阳开设书坊最多的是余、刘、熊三姓，三姓开设书坊近40家。它们除刻印经、史、文集、医书、类书外，还自己编写、



刻印了许多演义小说。如双峰堂的主人余象斗，经他编著和刊行的小说就有《四游记》、《列国志传》、《三国志评林》、《东西晋演义》等。忠正堂的主人熊大木，他也编著和刊印了《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乔山堂的主人刘龙田刻印了《千家姓》、《天下难字》、《西厢记》等书22种。刘洪的慎独斋刻印的史书、文集、医书较多，他校勘认真，错误较少。总之，建阳书坊所刻的小说、杂书、医书之多，超过了南京书坊。

至于杭州、北京的书坊，数目就少多了。杭州有书坊24家，刻书最多的是胡文焕的文会堂，刻书达450种，其中他自己编写的书就有二三十种：有《诗韵》、《词韵》、《琴谱》、《省身格言》等。北京书坊有堂号可考的只有13家，分布在正阳门、宣武门、隆福寺、护国寺等处。其中著名的有永顺书堂、汪氏书铺。前者近年发现有11种唱本和南戏剧本《白兔记》，这是戏曲中的最早刻本；后者刻书最多，从汪家的一张卖书广告中，所列书目就有14种，其中有经史、文选、诗

集，还有一部琴学的重要参考书《太古遗音大全》，可惜多已不传。

此外，江苏的苏州、常州、扬州、安徽的徽州，江西的抚州亦有不少书坊，刻书业也相当兴旺。

总观明代雕版印刷，其地区之广超过了宋元，它已由内地扩大到边远地区甚至台湾；刻印书籍的总数，可能达几万种之多，题材也十分广泛，这些也为宋元所不及；尤其是版画艺术到了明代，大放光彩，无论在数量上或技艺上都超过了前代，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境界。象刻于公元1498年的《西厢记》插图，构思精丽动人，雕刻细致入微，人物眉目传神，栩栩如生，真是开卷悦目，引人神怡。正象出版者在扉页上说的“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特别需要大书一笔的，是套印技术推陈出新，不但由元代的朱墨两色发展到了朱墨黛紫黄五色套印，而且在套版的基础上发展为多色迭印的恒（dòu 豆）版术印和拱花的印刷方法。恒版的操作方法是：在雕刻之前，先根据彩色画稿的设色深浅浓淡、阴阳向背的不同，进行

分色分版。每色一版，画面大的，要多至几十块小版。随后用透明的雁皮纸蒙上画稿勾描下来，反贴在木版上，雕成大大小小的印版。然后逐色由浅入深依次套印或迭印，印出的画面，不仅色彩妍丽，而且能显示出色调层次和阴阳向背；印出的花卉鸟虫，维妙维肖，几乎达到了乱真的地步。因为这种印刷方法是用零碎的木版拼凑堆砌，有如烩钉（dīng钉，烩钉是指几种拼在器皿中的仅供陈设而不食用的烩钉小饼），所以明人称作烩版。

烩版印刷始自明末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吴发祥（号萝轩）在南京编印的《萝轩变古笈谱》。稍后，寄居南京的胡正言编印了《十竹斋书画谱》<sup>①</sup>和《十竹斋笈谱》<sup>②</sup>，二书画、刻、印俱佳，对以后的彩色版画起了楷模作用。出版后，立即受到大江南北人们

---

① 《十竹斋书画谱》：公元1627年印制，分成翎毛、水果、兰、竹、梅、石、团扇面及书画八类，编入约180幅版画和140首诗的书法佳作，在中国艺术史上是首次对书画进行选辑和分类的著作。

② 《十竹斋笈谱》：公元1644—1645年间印制，分博古、雅玩、人物、花石等32类，辑入280余幅图。

的欢迎，初学画的人都奉它为临摹范本，对绘画教育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胡正言其人，聪明过人，多才多艺，擅长篆刻绘画，精于书法，喜欢刻书，又能造出优质纸墨，还精通医术，以医为业，人们称他“巧心妙手，超越前代，真千古一人。”他在自己的庭院内种竹十余竿，所以用“十竹斋”名其室，自号“十竹主人”。

上述二人还采用了“拱花”（又名拱版）的印刷方法。“拱花”是将雕版压印在纸上，好像现在使用钢印一样，把白纸压成凸出的花纹；或者把纸放在凸凹版之间，挤出拱趣的花纹。用它来衬托画中的行云、流水、花叶的脉纹和鸟类的羽毛。这种无色的印刷，更显出作品的素雅大方。欧洲的德国第一次采用拱花技术，已经是18世纪中叶以后了，比中国晚了100多年。

短版和拱花印刷技术的发明，把印刷技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中国印刷史上是一个大的飞跃，在世界印刷史上也开创了一个新纪元。由此可见，明代的雕版印刷已臻于登峰造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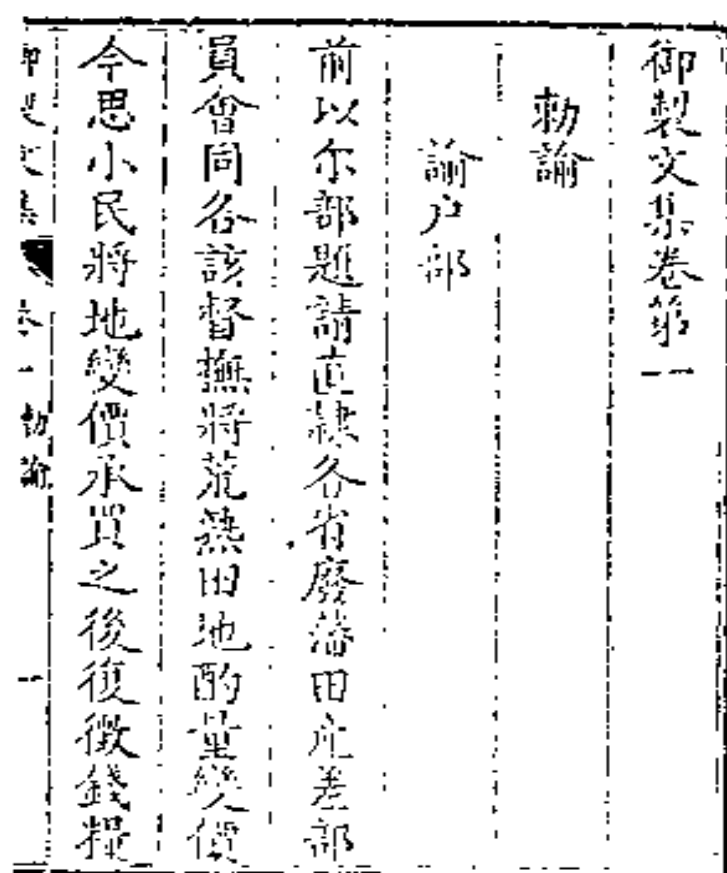
## 7 清代雕版印刷的衰落

清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王朝。公元1616年，东北建州女真的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齐建立了政权，国号金，历史上叫做后金。1636年，皇太极称皇帝，改金为清。1644年明亡，清军入关，顺治皇帝定都北京。

清朝前期（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前），国家实现了统一，社会相对安定，政治比较清明，出现了所谓国富民丰的“康乾盛世”，这为印刷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一面大兴文字狱，严酷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一面又崇尚文治，提倡学术研究，利用印刷为其政治服务，所以雕版印刷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到了清朝后期，外国入侵，社会动乱，经济凋弊，国力贫困，文化活动呈现衰退，加以西洋印刷术的传入，因而传统的雕版印刷也渐趋衰落，最后被西方传来的新的印刷技术所代替。

清代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坊刻方面都有所成就。

清代官刻本中，首推武英殿本。清初，  
宫廷刻书属内务府，所刻书籍称“内府本”。  
公元1680年，康熙帝在今故宫西华门内武英  
殿设修书处，把校定官员和刻写工匠聚集在  
一起，由翰林院词臣总领其事，从此，内府  
书籍、历代官本都由武英殿承刻，内府本也  
就改称“武英殿本”了，简称“殿本”。殿本  
以校勘精当、纸墨上乘、字体圆润、版式疏  
朗、装订端庄而著称。其中有些书因为是皇



清刻本康熙皇帝的著作《御制文集》  
公元1711年武英殿刻印

帝自己的著作，或是经过皇帝审阅、批准、修改的，所以在印刷时都冠上“御制”、“御批”、“御定”、“钦定”等字样。象公元1711年刻印的康熙皇帝的著作，就称《圣祖御制文集》；1716年刻印的著名字典就名为《御定康熙字典》；1739年乾隆皇帝诏刻的历代正史，就定名为《钦定二十四史》。武英殿刻本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盛：康熙帝时刻有63种；雍正帝时刻有71种；乾隆时期（公元1736—1795年）刻书最多。乾隆当政60年，以右文为治，所刻经史子集达100多种。道光帝以后，殿本数量就大为减少了。

官刻本除殿本外，就是地方官署刻本了。地方官署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主持的扬州诗局，所刻《全唐诗》、《佩文斋画谱》、《词谱》等10种书，将近3000卷，校对写刻都很精良，装订端庄大雅，其尽善尽美不亚于武英殿本。

鸦片战争以后，南方战火连年，为了补充动乱中损失的书籍，各省设立了官书局，所刻书籍称“局刻本”。各地官书局刻书数量大、质量高的是浙江官书局：首先它重视

选用善本作底本，如刻印的周、秦、西汉各家主要著作选辑《二十二子》，就是子书丛书中最完美的本子；其次它延聘名家校勘，如《九通》<sup>①</sup>和类书《玉海》，错讹很少，超过殿本；还想法缩小版式，增加行字，降低成本，使一般读者容易购买，所以在“局本”中享有盛名。“局刻本”多是“御纂”

“钦定”的经史诗文，也印普通读物，并且定价低廉。它刻印数量大，流通范围广，对文化的普及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曾设立镌刻衙、刷书局，刻印了太平天国领导人的许多诏书、文告、文献和儿童读物，如《太平诏书》、《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诛妖檄文》、《三字经》、《幼学诗》、《天历》等，这些书对于揭露清政府的罪恶、鼓舞太平军士气、推动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① 《九通》：即《通典》、《通志》、《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通考》。加上《皇朝清文献通考》，谓之《十通》。



除官刻外，清代从事私家刻书的，有当官的，为了博得“好学”的雅名，用公款或私款刻书；有著名的文人，为了传播学术成果，刻印前人的诗文和自己的著述；有著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学家，或复刻善本，或辑佚、校勘丛书、逸书。其中著名的有：乾隆时安徽歙县鲍廷博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30集，辑录了经史考订、算术、金石、地理、书画、诗文集、书目等著作207种；有咸丰时广东南海伍崇曜辑刻的《粤雅堂丛书》30集，辑录古书190种；有乾隆时江苏吴县黄丕烈辑刻的《士礼居丛书》，选采古书19种，这是一部以版本校对为特色的丛书；而私人刻书最多时间延续最久的是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钱家，从乾隆到道光年间，刻书从未间断，刻印了许多史书、医书和丛书，特别是钱熙祚辑刻的《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等丛书，辑录了古代佚而仅存或流传极少的著述，因此，这些书保存了大量的古代资料。

在家刻本中，有许多著述都是由名书法家精写上版，由著名刻工雕刻，写刻工整，

校勘精审，印刷极为精致。象康熙时的名书法家林佶写的散文家汪琬（人称尧峰先生）著的《尧峰文钞》、陈廷敬著的《午亭文编》和诗人王士禛（号渔洋山人）著的《古夫于亭稿》、《渔洋山人精华录》，被书林誉为“林氏四写”，是比较著名的精刻本。

直到清末，私家刻书仍然盛行不衰。其原因，除了政治上许多读书人怕罹难而隐身于书斋，和当时社会上大力劝人刻书也有关系。有位刻书家张海鹏就尝对人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修学，其道更广。”（见《藏书记事诗》卷六）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劝人刻书，他说：“今人各自问德业学问无以逾人，莫如刻古人之书籍，如吴之黄（吴县黄丕烈），歙之鲍（歙县鲍廷博），南海之伍（伍崇耀），金山之钱（钱熙祚），其姓名于五百年内必不至湮没无闻。”（见《书目答问》）所以终清一代，私家刻书蔚然成风。

清代官私刻书多是供应官僚地主士大夫阶层，而供应人民群众所需要的通俗读物则

仍然有赖于民间书坊。

清代书坊非常普遍。北京有书坊10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这些书坊有的以贩卖为主，有的兼刻印和发行。它们除印卖供应入京会试举人一般经史用书、八股试卷外，主要是刻印小说、民歌、俗曲、谜语、字典、医书、鼓词和初级满文课本等民间日常所需的通俗读物。苏州有书坊50多家，出版经、史、医书和大量小说戏曲。其经营最久刻书最多的是创设于明朝的席家扫叶山房，刻印了许多经、史、子、集、小说及村塾所用启蒙读物多达几百种。后来还设立分号于上海、汉口、松江等地。此外广东的广州和佛山镇也有不少书坊，刻印了许多小说和日用医书。至于此时的杭州、徽州、南京的书坊已远不如明朝兴盛了。

清代书坊，各省都有，刻书最多，发行面广，对发展文化普及教育是有功绩的。

清代的版画艺术，在清朝前期并不逊于明代，有些作品颇可称道。象清初画家萧云从（公元1596—1673年），他绘的屈原的《离骚》插图《离骚图》，构思深沉，寓意感人，

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衣服线条流动有力；他的另一套佳作是《太平山水图画》，绘的是安徽太平山水43景，全部山水景色，刻印绝精。这两套作品皆由当时精于木刻的良匠刘荣、汤义、汤尚等人刻成。前者刻于1645年，后者刊于1648年。另外康熙时的著名宫廷画师焦秉贞根据宋代同名绘画重绘的《御制耕织图》46幅，每幅画的天头都有康熙和其他人的题诗；另一宫廷画师王原祁绘的庆贺康熙六十大寿的《万寿盛典图》148幅，如果连成卷轴，可达166尺。这两套作品都先后由当时最杰出的木刻匠师朱圭刻成。前者刻印于1712年，后者刻印于1713年。还有乾隆时刻印的《圆明园四十景诗图》，画出了北京西北郊避暑御园内的40处景色，亦属佳作；康熙时吴熔画的《白岳凝烟》40幅，堪称清初“徽派”版画的上乘。

至于套版印刷，在清代前期也有相当成绩。如康熙年间内府刻本《御制唐宋文醇》是用五色套印的；道光年间涿州卢坤刻的《杜工部集》，是用六色套印的。这些作品色彩艳丽，配上洁白的纸张，读之令人悦目怡神。



清初徽派版画《白岳凝烟》刻印于公元1714年

但是，道光以后，无论版画艺术和套版印刷都渐趋衰落了，戏曲小说中虽然也附有不少插图，但刻工拙劣粗率，值得称道的佳作甚少。

19世纪中叶前后，西方的平版石印和凸版铅印以及其他新技术、新设备传入我国，逐渐取代了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雕版插图技艺。这样，我国人民发明的历史悠久的雕版印刷，在经历了1300多年之后，完成了它

的伟大历史使命，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 三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 1 宋代的活字印刷

雕版印刷发明之后，人们用木板做原料，相当省钱。一部书版，可以印出几百部，几千部，比起一字一句地靠手抄写，真是简便多了。它的发明和推广，对于文化的普及和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雕版印刷术还是有它的缺点的。第一，每印一页书就得刻一块版，每印一本书就得刻一副版，费的人力物力仍然不少。第二，一部大书，往往要化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刻成；如果印了一次不再印第二次，显然是很大的浪费；倘因不得已的事故半途而废，损失更大。第三，一块块书版，占据着大量空间，保存起来也不是容易的事。针对这些缺点，我们的祖先又继续钻研，努力改进，终于发明了

比雕版印刷术更为进步的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的原理和雕版印刷有相同的地方：这就是都先制成凸出的反体字，而后刷上墨，把它印在纸上。不同的地方是：雕版印刷是用整块的木板，而活字印刷用的是一个个单字。印书时，先把需要的单字排成版，就可以印刷了；印完后，再把书版拆开为一个个单字，以备下次排印。这样，一副活字可以根据不同的书稿一次次的排版，就可印出许多部不同的书，既省钱，又省力，印刷又快，大大提高了印书的效率。这种活字印刷术，就是我们祖先首先发明的，它的发明人就是我国宋朝的毕昇。

毕昇是北宋中期即公元11世纪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太少了。同时代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公元1031—1095年），曾著了一部《梦溪笔谈》，其中有一段关于毕昇的记载，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材料了。后人提到毕昇的事迹，也都是照抄或摘录沈括的原文。《梦溪笔谈》中说他是一位“布衣”，也就是说他是一位没有做过官的普通平民百姓，但他究竟是什么样的普通百



姓就无从知道了。有人因为沈括在书中另一地方说到一位“老锻工毕昇”，以为就是毕昇，因而推测他是一位铁工。但是就年代推算起来，似乎不可能是同一人。也有人说他是刻字工人，这也是推想，缺乏文献根据。电影《毕昇》，说他在杭州开设毕氏活字印书铺，也是虚构的，很不可信。毕昇的籍贯无从查考，有人说他是四川人；有人因为沈括是杭州人，因而推测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人，这些都没有充分根据。在发现新材料以前，毕昇的生卒年月、出生地点和职业只好存疑了。

现在我们知道的毕昇的唯一事迹，是他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即公元1041—1048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件事记载在《梦溪笔谈》中。

按照沈括所记，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可分为三个主要步骤。首先是制活字。他用一种质地细腻的粘土（胶泥），制成一个个家铜钱那样薄的小泥块，象刻图章一样在每一块上刻一个字，放在火上烧过，就成了坚硬的活字。每字都刻好几个，对于“之”、

“乎”、“者”、“也”这些常用字，每字刻20多个，以备排版时一字重复出现时使用。这些活字是活字印刷的基本工具。其次是排版。先预备一块铁板，上面铺上一层松脂、蜡和纸灰之类的东西，再用铁做一个书版大小的铁范（铁框）。印书时，先把铁范放在铁板上，依照书稿把所需要的活字排在范内，排满版后，就把铁板放在火上烘一下，使松脂和蜡稍一熔化，再用平板按压一下，使字面平整。等到松脂和蜡凝固了，这些活字就牢固地胶着在板上，排版的手续就完成了。最后一步，就是在版上施墨印刷。如果要加快印刷，可以用两块铁板替换，一版印刷，一版排字，前一版印完毕，后一版就准备好了。这样互相交替着用，既可节省时间，又可提高印刷效率。印刷完了，再把铁板放在火上烘一下，等松脂和蜡熔化，就可以把活字取下来，以备下次使用。在这一过程中，印刷的三个主要步骤——制活字、排版、印刷，已经完全具备了。因此，毕昇的这项发明，虽然还很原始简单，但它的基本原理与现在通行的铅活字排印方法完全相

同。从这里可以看到毕昇是很有科学头脑、富于创造精神的人。

值得惋惜的是，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推广应用。这主要是因为封建时代里，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不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当时统治阶级的史学家连毕昇的名字都不肯载入史册，更不要说期待封建政府支持这项发明了。同时，封建时代书籍的需要量虽然在逐步增长，但究竟十分有限，每次印书，往往印数很少，活字印刷的优越性，还不能充分显示出来。正如沈括所说：“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这说明一次印数太少，影响了活字印刷术的推广和应用；其次，也有技术上的原因，泥活字容易残缺，不能耐久，不易上墨。由于这些原故，活字印刷术未能广泛流传开来。

毕昇死后，他创造的活字，落到了沈括的侄子辈手里，被当作古董“宝藏”起来，这样，世界上第一副泥活字从此就默默无闻了。但是毕昇的这项发明，实在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这项技术并没有因毕

昇去世而被人遗忘，而是被后人继承下来继续使之发展。

在毕昇之后，南宋时，做过宰相的周必大（公元1126—1204年），曾仿照毕昇的方法，在1193年用泥活字印过自著的《玉堂杂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用沈括的方法（实即毕昇的方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这就是说把泥活字排在铜盘内，印成了这本书。这应该说是宋朝的最可信的泥活字印本，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活字印本。可惜原印本早已失传了。

宋朝以后，泥活字印刷还继续被人采用，并取得了成功。

## 2 元代的活字印刷

元代的活字印刷继续得到发展并有所创新，除沿用泥活字外，又发明了锡活字和木活字。

元朝初年，有个叫杨古的人，曾用活字版印过几部书，他用的活字可能是泥活字。他印的书有朱熹等人编的儿童教育课本《小

学》和北宋几位哲学家的言论集《近思录》，有南宋吕祖谦（世称东莱先生）著的《东莱经史论说》等，这些书也是我国较早的活字印本，不过比毕昇发明泥活字已经晚了200年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有位不知姓名的发明家，可能考虑到锡的熔点低，适宜于用字模浇铸活字，于是发明了锡活字。根据元朝初年著名的科学家王桢著的《造活字印书法》一书中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这就是说可能在宋末元初的时候，已有人用字模浇铸出锡活字了；印刷的时候，要用细铁丝把字串起来（字身上可能铸有小孔），排在字盘内，再用界条一行行隔开，就可以印书了。只是由于当时没有好的油墨，往往印坏，所以未能流行开来。但是，它却是我国最早的锡活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锡活字，它比欧洲人谷登堡用金属活字印书，几乎要早一二百年。惋惜的是，有关发明锡活字的这位发明家的姓名和生平事迹，王桢没有留

下记载，今天，除了对这位默默无闻的发明者表示崇敬以外，也就一无所知了。

元朝的锡活字虽然没有久行，但是它的出现，却是造字工艺上的一大进步。

在锡活字发明之后不久，元朝人又创造了木活字，它的创始人就是最早记载锡活字的王桢。

王桢这位科学家，对农业科学、机械制造和印刷技术都有重大贡献。他做过两任县官，生活俭朴，把自己的薪俸节省下来，修建学校、道路和桥梁，又教导农民种田植树，栽桑种棉，还帮助贫苦人治病施药，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事业，是一位很受人民爱戴的地方官。

公元1295年，王桢做了安徽旌德县县官，开始撰写他的不朽名著《农书》。为了出版这部著作，他请工匠按照自己的设计，花了两年的时间，刻制了3万多个木活字，这是我国第一副木活字。在这以前，据沈括说毕昇曾经想按照雕版印刷的方法，用木材做活字材料，只是因为木材沾了水就会膨胀，版面容易高低不平；而且木材经不起火

烤，和铁板上的药物粘在一起不容易取下来，所以才改用胶泥做活字，制作木活字的计划也就未能实现。

王祜制作木活字，又把活字印刷术大大提高了一步。他制作活字的方法是：先准备一方整块木板，把写满字样的纸反着贴在上面，然后仔细地雕刻。字刻好以后，用小细锯把单字一一锯下来，再用小刀修整，使木活字大小高低相同。这样，制作木活字的工作就完成了。

排印的时候，先制作一个方形木盘，把木活字一行行排进去，用竹片作为界行将字夹紧。排满一版后，再用小竹片垫平，用木楔塞紧，使活字固定不动；然后就可以在排好的字版上涂墨铺纸印刷了。

公元1298年王祜用木活字试印了他自己主编的《旌德县志》，全书6万多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了100部，速度又快，质量又好，这是见于记载的我国第一部木活字印本。不幸，它早已失传了。

他还创造了可以转动的排字盘（或称转轮排字架），那是类似圆桌面的转盘，盘的

直径约7尺，轴高约3尺多。盘内用竹条分隔成许多格子，格子依诗韵次序编了号码，每个字也编了号码，并登录在册子上，把木活字按照编号归入相应的格子内。一般常用字和杂字，排放在同样的另一大轮盘内。两个轮盘可以排放3万多字。排版时，一人看着文章喊字的号码；另一人坐在两个轮盘之间，转动左右轮盘，就可很方便地取出所需要的活字。这样，排字工人就不必走来走去了，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这在排版技术



元代描绘王祯木活字印刷工序的绘画

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王祯在木活字试印成功以后，总结了活字的印刷经验，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



附在《农书》后面。这是最早系统地叙述活字印刷术的文章，是研究我国印刷史的重要文献，已被翻成几国文字传到国外。

王祜创造的这副木活字虽然早已失传了，但是元朝的木活字，曾在甘肃敦煌千佛洞中发现了几百个，刻的是古代维吾尔文，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古的木活字实物。可惜这些木活字，在20世纪初期大部分被法国帝国主义份子伯希和盗走了，目前只剩下了5个，陈列在北京历史博物馆里，这是元朝木活字技术流传到兄弟民族地区的有力证明。

在王祜发明木活字以后20多年，有位在浙江奉化做州官的马称德，也雕刻了10万个活字，并且在公元1322年印成了20册一部的《大学衍义》若干部以及另外一些书籍。虽然记载中没有提到这副活字用的是什么材料制成的，但是一般认为是木活字，因此这是继王祜之后，又一次用木活字印书的记载。不过这部书也早已失传了，可是上述二人的印书事迹，证明了元朝初年木活字不仅流行于安徽南部，也已经流行到浙东一带了。

元朝以后，木活字继续流行，只是锡活

字被其他金属活字所代替了。

### 3 明代的活字印刷

明代的活字印刷，除沿用木活字外，又发明了铜活字和铅活字。

明代没有用泥活字印过书，只是少数文人用的图章是陶印或磁印，如海瑞用的黄泥印是用火烧过的，印文是“掌风化之官”。

明代的木活字印刷比之元代更为普遍。不仅在皖南、浙东一带流行，而且也流行于南京、苏州、福州及四川、云南等地。从事木活字印书的有各地书院、私家和书坊等。木活字印本有书名可考的约有100多种，其中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印本最多。其内容多是名家诗文集，也有史书、小说、艺术、军事和科技著作等，其中享有盛名的是战国人的著作《鹖冠子》，此书后来很得乾隆皇帝的赏识。同时，南方一些地方也开始用木活字排印家谱。从1638年起，明政府的公报《邸报》也用木活字印刷。北京就有以送《邸报》为业的报房，《邸报》上也登载一些奇闻怪事，颇受朝野人士的欢

迎。

明代继元代发明锡活字、木活字之后，又发明了铜活字。

我国何时铜活字，至今说法不一。有说开始于五代的：有人根据明朝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进士杨守陈在《朱氏经义考》中说：“晋天福（公元936—943年）有铜版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庸笔写。”认为这里所说“铜版九经”不是指把40多万字的《九经》雕刻在一块或几块大铜版上，因为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恐怕是不可能的，因而以为是铜活字。有说开始于宋朝的：有人根据清朝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宋刻有铜字刻本、活字本”，认为宋代已有了铜活字。还有说开始于元朝的：有人根据元朝人黄溍在《智延和尚塔铭》中，“三岁将镂铜为板以传”这句话，认为元朝已有了铜活字。其实，这些说法都缺乏有力的资料和实物来证明，只不过是推想而已，难以为凭。

根据完全可信的资料，我国真正用铜活字印刷还是明朝中期的事。在弘治和正德年

间，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一带，就有不少书坊制造铜活字印书，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无锡的华家和安家，他们用铜活字印的书数量最多，流传下来的也不少。

华家以华燧最有名，此人自以为对铜活字“会而通矣”，故以会通为号，他铸成的一副铜活字，也名为“会通馆铜版”。大约在1490年，他第一次试印了《宋诸臣奏议》大小两种字体的版本。这次印刷，由于金属本身不吃墨，印得墨色糊糊；再加上排版参差不齐，校对不精，远远比不上朝鲜铜活字的精美，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因而也特别为人们所珍贵。后来又印了南宋类书《锦绣万花谷》和有关唐宋人野史杂说的丛书《百川学海》等大书以及他本人的著作。前后印书可考者达18种之多，约在千卷以上，就其数量而言，在明人铜活字印本中是首屈一指的。

稍后，华燧的叔伯华理（chéng呈），也制造了精密的铜活字。他很喜欢收藏古书，他称自己的书斋为“尚古斋”。每次得到稀有古书，很快就排印出版。他在弘治十五年（公

元1502年），印成了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续稿》，印本质量超过华燧的铜版。

再后，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热心从事铜活字印刷事业。华坚印的书以“兰雪堂”为名，先后印了汉朝著名文学家蔡邕的《蔡中郎集》（蔡邕官至左中郎将，习惯上称蔡中郎），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和元稹的《元氏长庆集》，并于1515年印了唐代类书《艺文类聚》100卷。随后又印了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总之，从公元1490年到1516年，不到30年间，华家共用铜活字排印了大约24种书籍，1500多卷，这些书传世稀少，很为藏书家所宝贵。

当时，和华家齐名的还有无锡的安国，他是一个“富几敌国”的大地主大商人，号称“安百万”。他为人比较开明，曾经为地方上做过不少的公益事业，又喜欢古书名画、造字印书。他印的书，称为“安国活字铜版”，又因为他家种有大量桂花，所以也

称“桂坡馆”。他从1521年到1534年印了至少10种著作，内容有地方志、水利通志、文集和两种大部类书，均以印刷精美、校勘严谨著称。其中最先出版的《东光县志》是我国唯一一部用铜活字印的地方志。可惜安国的这副铜活字，在他死后被他的六个儿子瓜分了，每人所得都残缺不全，成了无用的废物。

明代用铜活字印书，除上述两家外，还有南京的张家、苏州的孙家都有印本流传下来。特别是福建的芝城（建宁的别名）所印的《墨子》一书，是蓝色印本，印得异常精美。大概在江苏南部地区，还用铜活字印了大批唐人诗集，如《唐玄宗皇帝集》、《许敬宗集》、《骆宾王集》等共约50种，这些诗集字体古雅，版式疏朗，行款一律，纸张有黄白两种，都是明代的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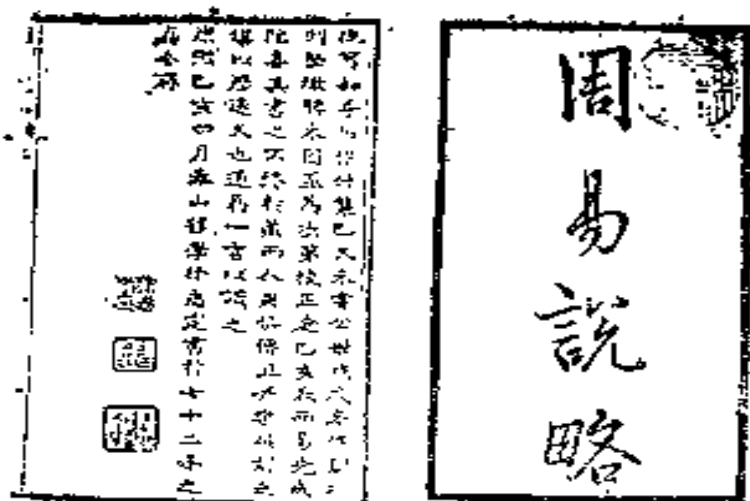
总观明代铜活字印书，以无锡华家为最多。华燧作为第一位用铜活字印书的人，是一位很富于创造精神的人，他解决了铜活字的镌刻、排字、施墨、印刷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对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至于明代发明铅活字的事，历史上记载很简略。16世纪初，陆深在他著的《金台纪闻》中说：近来常州人用铜、铅做活字，比雕版印刷要方便巧妙得多。但是排印时容易发生错误，所以他认为这种方法不可取。当然这种对铅活字的评价是不公允的。当时用铅活字印过什么书，没有留下记载，也没有印本流传下来，不过明代发明了铅活字这是事实，只是没有大量使用而已。

#### 4 清代的活字印刷

清代的活字印刷，除沿用泥、木、锡、铜、铅等活字外，还发明了磁活字。

清代发明的磁活字，就是有名的“泰山磁版”。公元1718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在泥活字上加上一层磁釉，烧制成了磁活字。1719年印成了当时山东经学家张尔岐著的《周易说略》和作者阅读儒家经典的心得《蒿庵闲话》。由于受到封建社会的束缚，那时没能大量印刷，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存，印本早已散失了。公元1961年济南旧书店购到了《蒿庵闲话》；同年，北京也



清代磁活字印本《周易说略》印于公元1719年发现了《周易说略》，这两部珍贵善本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印刷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从此，我国有了磁活字印本书籍。磁活字的优点是质地坚硬，不受寒暑 湿燥 的影响，在活字印刷技术上是一大进步。

清代采用泥活字印刷的有两人。

一是苏州人李瑶，他于公元1830年在杭州印了《南疆绎史勘本》，数年后，又印了《校补金石例四种》。他自己说是用“仿宋胶泥版”印成的。

另一位是安徽泾县的翟金生。他于公元1844年印成了他的诗集《泥版试印初编》。

翟金生出身于“书香世家”，但他不是举人进士，也不是达官闻人，而是一个屡试



不第的穷秀才。他靠教书为生，能诗善画，书法也不错，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家境虽不富裕，但却十分热心印刷事业。他为了解决一般穷苦读书人借书的困难和想雕刻善本而又没有力量的苦恼，于是，就仿照毕昇遗法制造泥活字。他和他全家的人用了30年的时间，几乎竭尽了全家资财，耗尽了他毕生精力，才制成了10万多个仿宋体泥活字，分大、中、小、次小、最小五号字体，自称是“泥聚珍版”，含有聚集珍宝的意思。在他古稀之年时，终于试印成功了他的诗集。书中有他著的“拙著编成赋五绝句”，道述了自己30年来刻字、排字、写作、编辑、印刷的艰辛过程，现抄录如下：

自刊

一生筹活版，半世作雕虫，  
珠玉千箱积，经营卅载功。

自检

不待文成就，先将字备齐，  
正如兵养足，用武一时提。

自著

旧吟多散佚，新作少敲推，

为试澄泥版，重寻故纸堆。

自编

明知终复会，此日且编成，

自笑无他技，区区过一生。

自印

雁阵行行列，蝉联字字安，

新编聊小试，一任大家看。

在这之后，他又印了他的朋友黄爵滋的诗集。在他82岁时，又叫他的孙子印了《翟氏宗谱》。这些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近年都不断有所发现。印本字划清晰方正，印工精致，行列整齐，比之木活字印本毫不逊色，如果不是他自己说明，很难想像是用泥活字印的，它有力地证明了《梦溪笔谈》里关于泥活字记载的真实性。过去有些中外学者认为泥活字一碰就碎，不能印书，这一错误说法随着泥活字印本书的发现，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翟金生这位中国印刷史上唯一的一位兼作家和印工的教书先生，为了“表彰绝业，补缀残编，莫令古书漫漶（huàn患）”，几十年如一日，他那孜孜不倦的创造精神和坚

韧不拔的毅力，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

清代的木活字印书比明代更加盛行。

首先清政府就大规模地使用木活字印书。公元1773年经乾隆皇帝批准，在皇宫内的武英殿刻制枣木活字，于第二年完成，共刻了253500个活字。先后印书134种，共2300卷，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乾隆帝认为活字版的名称不文雅，就把它改称“聚珍版”，因此，这些木活字印本书，就叫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当时负责印刷的官员金简，总结了这次印书的经验，写成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这本篇幅不长但图文并茂的书，堪称印刷技术的专著。全书共分19节，从制造木子、刻字到排版、校对、印刷等一整套操作技术，都有详细具体的记载，并一一绘图说明。从这里我们知道《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刻印，分工明确，程序严密，印刷工艺十分精到周全，比王祜的《木活字印书法》有了改进和发展，它说明我国的活字印刷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这副珍贵的木活字长期贮藏在武英殿内，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后来竟被值

班的卫兵们用来烤火烧掉了，真是可惜得很。

由于清政府的带头和《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的问世，各地衙门、书院和官家书局纷纷仿效，使木活字印书几乎遍及内地各省。此外，私家用木活字印书的也很多，闻名于世的《红楼梦》一书的第一次出版，就是在公元1791年由高鹗、程伟元用木活字印刷的。有名的史学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是藏书家张金吾印行的，字体相当整齐。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广东有个县官，刻了木活字36万个，刻工也很精美，其数量超过武英殿版木活字约三分之一，可以说开创了我国木活字数量上的新纪录。

还有一些营业性书坊，也采用木活字印书，象清朝末年北京的聚珍堂，就排印了大量的通俗小说。南方的苏州书坊还翻印了日本人的书。在上海有的人还同时开办书局，一面印书，一面卖书。总之，南方各地都有木活字印本。现在流传的清朝木活字印本，大约在2000种左右。

清朝木活字印本，内容涉及很广，其中

以历代诗文集较多。但是，一部书的印数，也只有几部、几十部，最多也不过100多部。印书数量最大的是家谱，家谱也叫族谱，就是记载一姓的世系和重要人物的事迹。它开始于宋代而盛行于清朝。那时，江浙一带有专门以排印家谱为职业的“谱师”，每当秋收以后，他们就挑起活字担子，5人或10人一伙，走乡串镇，为人家印家谱，半年以内，就能印完一份家谱。

清朝也用木活字印报纸，除清政府印的《京报》外，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用木活字印了《中外纪闻》，隔日一期，随同《京报》附送王公大臣，上面登载政治新闻，宣传变法图强，对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代也有锡活字。

据一位美国人记载，广东佛山镇有个姓唐的书商在公元1850年用泥模浇铸了锡活字。那时的佛山镇工商业发达，出版业兴旺，是清朝著名的出版业中心之一。这里出版的读物销路很好，不仅行销内地，也远销南洋各国，这引起了唐姓书商的兴趣，他投资1

万多元，前后铸造了三副字体不同的锡活字：一副是扁体字，一副是长体大字，一副是作为正文小注用的长体小字，共25万个。字体美丽大方，不但在造模、铸字与排印方面取得了成功，并且解决了中国墨不易被金属活字所吸收的技术问题。

公元1852年，他出版了元朝史学家马端临著的关于古代典章制度的《文献通考》，这是世界印刷史上第一部锡活字印本。可惜这位在我国锡活字印刷史占有重要地位的书商兼印工的人，没有在书本上印上自己的名字，后人只知道他姓唐而已。他铸造的这副锡活字，在公元1854年被当时的天地会起义军用来造成了枪弹打击清军。从此以后，关于锡活字的文献记载就很少见到了。

清代的铜活字印刷很受明朝的影响。清政府一开始就在宫廷中造出了一大批铜活字，约25万个，这就是“武英殿活字版”。康熙末年（公元1713年）曾用它排印了天文书《星历考原》，数学书《数理精蕴》。雍正初，1724年，又排印了音乐书《律吕正义》。但是，最有名的内府铜活字印本要算《钦定古今图

书集成》了。这部书是康熙年间由陈梦雷等人编纂，雍正初年由蒋廷锡等人校对，大概在公元1725—1726年印成。这是一部篇幅巨大的百科全书，共印了66部，每部1万卷，约有1.6亿个字，分订成5020册，装入522函。这样一部巨著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印成了，其时间之短，实在惊人。该书把古今学问分门别类，从天文、地理、动植物到社会制度、经济、历史以及各种器具用品和外国情况，都旁征博引，详细说明，并有许多精美插图，是一部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工具书，一向为中外学者所重视。它比同时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我国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都要广大精详得多。它用大小两号字体排印，大字正文，小字注文，字体端正秀丽，版式整齐，印刷清晰，装潢漂亮，实为我国绝无仅有的大百科全书。但是现在已很难找到一部完整的原本了。

这副宫廷铜活字，后来再没有印过别的书，它被搁置在武英殿的铜字库中，由于主事官员的盗窃，铜活字逐渐减少，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就趁北京钱币短缺之机，奏请

把铜活字熔掉，改铸铜钱，于是公元1744年，就把这批残存的宝贵铜字，统统熔化铸成铜钱了。

那时，还有一些私家、书坊也用铜活字印书。江苏常熟的“吹藜阁”，在公元1686年印过一部《文苑英华律赋选》，这是现在所知清代最早的铜字印本，它比《古今图书集成》还要早40年，是用楷体字印的。满洲将领武隆阿也曾造了铜字，并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在台湾印过《圣谕广训》，这部书内容陈旧，但“字画精致”。此外，常州一家书坊印过徐氏宗谱，这是家谱中唯一的铜字印本。杭州有两位官员也用铜活字印了诗文集和军事著作丛书。太平天国也从事过铜活字印刷。最有名的是福州的林春祺，他从公元1825—1846年，用了21年的时间，花了20万两银子，刻成了大、小铜字40多万个，其数量之多，在亚洲制造金属活字史上是少有的。这副刻制的铜字，名为“福田书海”，是用正楷书写，镌刻工整，曾用它印过清初学者顾炎武著的《音论》和《诗本音》，还印过行军时医疗用的《军中医方备要》。



他还写了一篇《铜版序》，叙述了他造铜活字的原因和经过，是一篇有关刻制金属活字的重要文献。

清代铜活字的流行范围和雕刻的精致都超过了明代，只是印本没有明代多。清代流传至今的铜活字印本已经不多了。

清代也有铅活字。公元1834年魏崧著的《壹是纪始》一书中说：“今又用铜、铅为活字”。可见从明到清，我国一直有人在用铅做活字。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铅印才逐渐在我国盛行起来，西方用字模铸造的铅字代替了我国的各类活字，成为了近代印刷的主流。

## 四 中国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伟大国家，现在世界各国的印刷术都是由中国直接或简接传去的，或者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印刷术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 1 印刷术传入亚洲各国

朝鲜是首先接受中国印刷术的国家

中朝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两国就开始了文化交流。南朝时期，中国宫廷里有高丽、百济的乐舞，朝鲜有中国的学者、工匠、画师在那里讲学，传授技艺。

7世纪时，唐都长安有许多新罗留学生，他们广泛研究中国文化，回国时，又往往带走大批书籍，并把学到的文化知识、工艺技术，在国内传播推广。象后来的新罗著名学者崔

致远，12岁来中国，18岁在唐中进士，回国后，他的书法、诗文在新罗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雕版印刷术传入朝鲜，首先是从传播佛经开始的。新罗和高丽王朝都崇奉佛教，以佛教为国教。唐朝时，新罗的僧人就从中国带回写本《大藏经》，受到全国的欢迎。举世皆知的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本，也是从中国带回的。宋朝《开宝藏》印成后，宋政府先后赠给高丽王朝三部。11世纪上半期《契丹藏》印成后，辽又送给他们四部，慧昭和尚又买回三部，仅从辽获得的就不下六七部。此后他们以此为蓝本，利用本国生产的好纸好墨，仿照中国雕版印刷，从公元1011—1082年，历时71年，刻成了第一部工程浩大的《高丽藏》，全书6000多卷，被称为“高丽国之大宝。”可惜公元1232年蒙古兵入侵高丽时，大部大藏经版，全部被烧掉了。但是，由此可知，中国雕版印刷术传入朝鲜，大约在10世纪末，而朝鲜自己刻印书籍，则始自11世纪。

公元11世纪，高丽王文宗的儿子王煦（法

号义天)，曾游历中国和朝鲜许多地方，搜集了宋、辽、朝鲜佛教大师的著作，于公元1101年编成了4000卷的《续藏》，刊印后，曾分赠给宋、辽和日本几部，不过今天多已散失，残存无几。

公元1237—1251年，在高丽贵族崔氏父于大力鼎助下，历时15年，又重新雕刻了一部《大藏经》，全藏共6791卷，刻版81258块，每块版两面刻字，这就是有名的八万《大藏经》。直到今天，8万多块经版，几乎还完全无损地保存在朝鲜南部庆尚南道伽倻山上的海印寺中，这可能是目前保存在世界上最大和最古老的一套完整的木雕印版。因此海印寺被称为“海东敦煌”。

朝鲜刻印非宗教书籍也始于11世纪。那时，高丽王朝一面从宋朝购买大量书籍和书版，如义天和尚就曾运回《华严经疏》版片和1000卷的印本及写本书籍；有些福建商人还代他们定刻书版，用海船运去，从中获取厚利。一面为适应科举考试和文人学士对书籍日益增长的需要，又翻刻了很多中国的儒家经典、史书和医书。公元1042年刻印了

《两汉书》和《唐书》，随后，又刻印了《礼记正义》、《毛诗正义》和《伤寒论》、《肘后方》等。

12世纪初，高丽王朝在国子监设立印刷所，开始大规模印书，政府藏书达到几万本。

公元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建立李朝，改国号为朝鲜。李朝建立后，由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活跃，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量更大。因此，政府和民间都大量翻刻中国的重要经、史、子、集、医学著作和通俗小说，同时也出版朝鲜人自己的著作，如《三国史》、《高丽史》、《朝鲜历代史略》和三大医术：《乡药集成方》、《医方类聚》、《东医宝鉴》<sup>①</sup>等。古代朝鲜没有文字，一直使用汉字，到了公元1446年，名曰“谚文”的朝鲜文字才创造出来了，从此，又有了谚文印本和中谚文对照本。这时，朝鲜的印刷事业也随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传入，进入了活字印刷的新阶段。

---

<sup>①</sup> 《东医宝鉴》：许浚著，公元1613年成书。分为内景、外形、杂病、汤液、针灸等编。明清时，受到中国和日本医学界的重视，曾在中国刊印流传。

还在11世纪后半期，义天和尚旅居杭州时，很可能就获知了同时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记关于泥活字的发明；同时中国古代铸钱的方法也在此时传入了朝鲜，这对朝鲜采用活字印刷都起了推动作用。

到了13世纪初期，朝鲜开始采用活字印刷。有一本朝鲜的文献中提到，公元1234年左右，有一部《古今详定礼文》就是在朝鲜江华岛用“铸字”印刷的。稍后，又有《南明证道歌》铸字本。有的学者认为后来李朝时代的铸字多是铜字，所以把这两种铸字本都算作铜活字。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朝鲜就是现在所知世界上最先铸造铜活字的国家，这一发明大约晚于毕昇发明泥活字200年，而比德国的谷登堡在15世纪40年代发明的铅活字却早了200多年。

朝鲜的铸字方法，据15世纪朝鲜学者成俔（qiàn欠）说，是先将黄杨木刻成字，压入软的胶泥中做成字模，再把溶化的金属倾入范内凝固成字，然后加工成为能用的金属活字，这和中国铸铜印的方法几乎是一样的。

朝鲜采用木活字印书，开始于公元1376

年，这年印成了《通鉴纲目》。到了90年代，又印了附有朝鲜方言文字注解的《大明律》和《功臣都监》及李成桂传记。《功臣都监》是朝鲜现存最早的木活字本。但到了15世纪，木活字印刷逐渐为铜活字印刷所取代。

公元1403年，朝鲜政府设立了铸字所，开始大规模铸造铜活字，此后460多年间，共铸造了近30幅金属活字，其字数达二三百万个之多。其中除一幅铅活字、一幅铁活字外，均为铜字。由此可知，朝鲜也是最先大量铸造金属活字的国家，从此，用铜活字印书成为朝鲜印刷的主流。在各套铜活字中，以1434年据称是仿效四世纪东晋著名书法家卫夫人<sup>①</sup>书法而刻铸的字体，最精美最流行，是最受人喜爱的活字印刷体。这年是甲寅年，称“甲寅字”，甲寅字被称为“朝鲜万世之宝”。两年后，朝鲜人民又创造出铅活字。公元1436年，第一次用铅活字印了《通鉴纲

---

<sup>①</sup> 卫夫人，姓卫名铄，汝阴（今安徽合肥市）太守李矩妻，人称卫夫人。工书法，王羲之年少时，曾以她为师，学书法。

目》（即《思政殿训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铅活字印本，这年是丙辰年，这次铅字称作“丙辰字”。丙辰字书法浑厚，大而醒目。《通鉴纲目》正文用的是铅铸丙辰字，小字用的是铜铸甲寅字，二者混合排印，是印刷史上稀有的珍本。朝鲜人民发明的铅活字，比谷登堡的《四十二行本圣经》约早了20年。

公元1729年，朝鲜人民又用铁活字印了《西坡集》，铁活字字体清秀，美丽悦目，更为世界上所独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朝鲜人民是勤劳智慧的，他们不仅善于吸取中国人民的科技成果，而且还善于推陈出新，创造出铜、铅、铁等金属活字；它的印本书籍，校勘认真，印刷清楚，纸墨装订均臻上乘。这是朝鲜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也借鉴了朝鲜人民的宝贵经验，朝鲜的印本书籍一向受到中国人民的好评，朝鲜的墨色泽漆黑发亮，纸张精密细致，都是印刷书籍的佳品，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中朝两国人民在印刷技术上互相交流，彼此促进，共同推动



了印刷事业的发展。

中国印刷术传入日本，可能稍晚于朝鲜。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自古密切。3世纪时（一说4世纪后半叶），朝鲜学者已把中国的《论语》、《千字文》呈献给日本朝廷。

5世纪时，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日本。7至9世纪，日本派出了十多批“遣唐使”来到中国，他们把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技术和佛教经卷带回日本。公元865年，日本僧人宗睿又带回两部印本字书《唐韵》和《玉篇》。中国的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也带去了很多佛教经典和与佛教有关的建筑、雕刻艺术、医学知识等。公元983年，宋太宗赠送给日本僧人裔（diāo刁）然一部完整的《开宝藏》印本。这些文化交流特别是印本书籍的传入，对日本的印刷业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日本自己刻书，究竟始于何时，说法不一，比较可信的物证，是公元1088年在日本奈良兴福寺刻印的佛教典籍《成唯识论》，这是日本确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在这之前，有所谓宝龟本《无垢净光经

根本陀罗尼》佛经四种，因为当时分放在100万座小木塔中，故又称“百万塔《陀罗尼经》”。这些佛经据某些文献记载，是公元763—770年之间的印本，770年是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元年。宝龟本，许多学者认为是招聘中国工人到日本印造的，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木版印刷品（也有人认为有用铜版印刷的，或认为是活字版印刷的）。但是，日本文献上并没有说是印刷品，印刷物本身也没有留下刊印的年月，因此，有些学者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

继《成唯识论》刊印之后，日本刻印佛经就日渐多起来了。日本是以佛教为国教，那时，抄印、广施佛经被认为是佛门的大功德，据说可以消灾延寿，修好来世，普渡众生，超渡亡灵。于是，到了13世纪，和尚尼姑、善男信女，纷纷捨财刻印佛经蔚成风气。其中最有名的有五座禅宗大寺刻印的“五山版”，五山寺不仅大量刻印宗教书籍，还翻刻了许多汉文儒书、医书和诗文集。日本翻刻的中国第一部书是公元1247年出版的《论语集注》，翻刻最早的诗文集是公元

1325年出版的唐朝诗僧寒山子的《寒山诗集》，翻刻最早的医书是公元1528年出版的《医书大全》。直到16世纪末，日本的印刷事业可以说完全由佛教寺院垄断。17世纪时，一项规模宏伟的雕印工程仍然是由寺院完成的，这就是铁眼禅师在中国禅宗法师隐元的帮助下，从公元1669—1681年用六万块樱桃木雕版，印成了全部《大藏经》，因为这部藏经是在日本京都黄檗（bò）山万福寺刻印的，所以称“黄檗版”，这套雕版今天还保存在该寺中。

日本古代没有文字，是采用汉字作为记述工具，后来参照汉字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制了日本文字“假名”，但汉字仍然流行。日本用自己的文字刻印书籍，开始于14世纪，不过，一直到17世纪，刻印的日文版书籍并不多，刻印最多的还是汉文书籍，只是读法不同。

应该说，日本早期印刷业的发展，是和中国工匠的帮助分不开的。元末明初，大约有四五十名中国雕版工匠避乱东渡日本，参加了五山版的镌刻工作，其中最有名的是元

末的陈孟荣和明初的俞良甫。前者手艺精妙，自称“孟荣妙刀”；后者长期侨居日本，刻书十多种，被称为“俞良甫版”。他们不但刻印佛经，还刻印了识字课本《蒙求》，字书《玉篇》和《杜工部诗》、《昌黎先生联句集》等唐宋名家作品，使很多中国著作得以在日本流传。同时，他们还为日本培养了一批优秀刻工，大大提高了日本的印刷质量。中国工匠对日本印刷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直到今天日本人还忘不了他们的功绩。

直到明治维新前，日本印书主要采取雕版印刷。

日本采用活字印刷术，开始于16世纪90年代初。先是意大利耶苏会传教士范利安，从印度果阿带到日本一部西洋活字印刷机，并印了一些罗马拼音的日本书籍和西文书籍，目前尚存的还有约30种，包括传教的小册子、字典、语言学习材料和文学作品等。但是由于日本严禁异教，使这位传教士带来的西洋活字几乎没有对日本文化产生什么影响。紧接着，公元1592年日本发动了侵朝战

争，把朝鲜的一批铜、木活字劫往日本，第二年，日本就制成了木活字。现存最有名的木活字本是公元1596年出版的《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1597年出版了《劝学文》一书，书中明确记载“此法出朝鲜，甚无不便”。从此，活字印刷术在日本政府、私人、寺院中逐渐推广开了。到了公元1637—1648年间，日本就用木活字排印了全部《大藏经》6326卷。在此之前，中国和朝鲜还没有用活字印过《大藏经》，这次是用活字印刷的第一部《大藏经》，因为这部藏经是由宽永寺僧人天海发起印刷的，所以被称为“宽永寺版”或“天海版”。此外，还根据中国和朝鲜的底本排印了中国的史学、文学以及诸子百家、各种医书、小说等。同时还出版了日文文学作品。日本用铜活字印的书籍不多，有公元1616年印的《群书治要》和1621年印的《皇宋类苑》，这些书在中国早已失传了，而日本却有印本。日本出版的书也有不少流到中国，使中国久已不传的书得以保存下来。由此可见，中国印刷术传入日本，不仅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也增进了中日两

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印刷术也传入了越南。

越南和我国毗邻，两国在文化上早有交流。大约在3世纪时，我国的造纸术就可能传入了越南北方，那时的越南就曾向中国进贡过自产的纸。我国唐朝时期，好些中国文学家到过越南；越南人姜公辅在唐朝中了进士，并担任要职。11世纪时，中国的书籍传入越南，当时的北宋政府曾应越南的请求，先后赠送给他们三部《大藏经》和一部《道藏经》，越南的使节也常在北宋的京城汴京购买书籍，或者用土产、香料换回书籍。大量中国书籍流传到越南，对越南自己刻版印刷无疑是起了启迪作用的。

到了13世纪50年代，越南政府用木版印成了“户口帖子”，这是见于越南史书记载的最早的印刷品。但是越南政府正式出版书籍，则是公元1435年的事（一说1427年），当年第一次刻印了儒家典籍《四书大全》，此后1467年，又刻成了《五经》印版。由于官刻书籍愈来愈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在文庙（孔子庙）专门造库储藏。越南官刻书也仿

照我国有国子监本、集贤院本、内阁本等。与此同时，民间坊刻也多起来了，它们也仿照中国书坊的名称，起名为文会堂、锦文堂、广盛堂、聚文堂、乐善堂等，河内就是书坊的集中地。它们用汉文和越南文刻印了佛经、经、史、诗文集、儿童读本、家谱、传记和小说。

越南古代没有文字，中国的汉字、汉语传入越南后，越南利用汉字为素材，创造了越南文字“喃字”，这种文字在李朝（公元1010—1225年）已经出现，13世纪已普遍通行。因此早期的越南印本，不仅有汉文版，也有喃字版和汉文、喃字对照版，其中汉文版书籍最多。

到了18世纪初，越南也有了木活字印本，现知较早的印本是公元1712年出版的《传奇漫录》。后来越南政府又从中国买去一副木活字，印刷了“钦定”、“御制”一类政典、诗文集等。可见越南的活字印刷术也是由中国传去的。不仅如此，连越南的版画也受中国影响很深，他们彩印的年画，从题材到印刷方法都和中国的年画相似，有的

可以说是中国年画的翻版，越南印刷受中国影响之深，可以想见。

大约在16世纪，中国印刷术也先后传入到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县）和菲律宾。

琉球在明清时期，和中国交往密切。公元14世纪末，琉球国王曾派遣留学生到明朝都城南京去学习，明太祖也下令把36家船民和工匠移居琉球。中国不少书籍就是通过留学生和往来的商人带到琉球的。大约与此同时，琉球也有了纸张，并会使用中国文字。到了16世纪初期，琉球国王就刻印了中国的《四书》、《五经》、《小学》（宋朝朱熹等编的儿童教育课本）和文学等书，有些印本上还刻印上孔孟像，加印了圈点，加注了日文假名的读音。还出版了本国学者的一些著作。清朝派往琉球的使节，还带去了中国的雕版工匠，可见琉球的印刷术也是由中国传去的。

我国福建、广东一带人民，唐宋以来就到南洋一带谋生，到了明代，去的就更多了。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其中包括印刷技术和大量书籍。到菲律宾的中



国印刷工人，甚至直接开创了那里的印刷事业。据文献记载，公元1593年，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总督分别利用汉文和菲律宾土语太格罗文刊印了基督教典籍的译本，汉文版书名译作《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现仅存一本，保存在西班牙马德里国立图书馆中。两种木版印本都是出于当地中国印工之手，1604年出版的两部金属活字印本，也是由中国印工印成的，可见菲律宾的印刷事业是由中国工人开创的。

此外，中国印刷术也传入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洋其他地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印刷术，大都由移居在那里的华侨创始的。由此可见，华侨不仅积极参加了居住国的经济建设，也为南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至于地处西亚的伊朗，接受中国印刷术要比南洋各国早一些，传入的渠道是经过我国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公元9世纪，我国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hú胡）人居住在这一地区，这里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是印刷术西传道路上首先必经的孔道。20世纪初，由德

国、日本和中国组成的考察队，在吐鲁番的古代寺院遗址中，发现了有17种文字所写的文件，有6种文字的雕版印刷品，其中以汉文、维吾尔文、梵文为最多。1907年，还在敦煌发现了大约在公元1300年回鹘人创制的维吾尔文的木活字。经过对这些印刷遗物的分析表明，在十三四世纪的时候，吐鲁番曾是各种文化的荟萃之地，这一地区的印刷业曾经相当发达，由于书籍的流传，我国的印刷术也就传入了伊朗。伊朗在我国史书上称安息或波斯。据记载公元1294年统治波斯的蒙古伊儿汗国<sup>①</sup>，在都城大不里士发行了一种纸币，上面印有汉文和阿拉伯文，并且借用了中国的“钞”字来表示钱，随后还把这个词纳入波斯语汇，这显然是宗法中国的印刷术，因此，可以说这是波斯第一次用中国雕版印刷术仿照元朝的宝钞印制的。公元1310年波斯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拉施德丁（Ra-shid al-Din）在其名著《世界

---

① 伊儿汗国：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公元1258年建立，建都大不里士，疆域以波斯和小亚细亚为中心，东自阿姆河，西濒地中海，南达印度洋，北到高加索，位于欧洲和中亚之间，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上起着一定的作用。

史》一书中，把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包括誊写、校对、镌刻、印刷和发行都一一详细地记载下来，几年后，拉施德丁关于中国印刷术的记载，又被一位阿拉伯学者全文引入自己的著作中。这些都证明了中国印刷术不仅传入了伊朗，而且也影响了阿拉伯国家。同时波斯的纸币和拉施德丁的著作，都曾流传到欧洲，这对于欧洲人认识印刷术的意义、方法和作用是有帮助的。

波斯也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大不里士又是一座国际性都市，那里聚集着中国人、蒙古人、欧洲人和中亚、西亚许多国家的人，中国的印刷术很可能通过波斯传向了欧洲和非洲。

## 2 印刷术传入欧洲、非洲和美洲

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是有诸多因素的：首先13世纪兴起的元帝国，地跨欧亚两洲，幅员辽阔，国家强大，这就为东西方人员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其次，元朝发行的纸币，已经达到“每日印造不可数记”的程度，流传极广，这也促进了印刷术的传播。欧洲人

最先看到的中国印刷品，就是元朝的纸币；再者，那时的中国文化仍为欧洲人所倾羨，因而欧洲人慕名而来的旅行家、商人和使团接踵而至，元大都和杭州都是当时闻名世界的国际性大都市。象法国的传教士罗伯鲁(William Ruysbroeck)在公元1253—1254年间，曾奉法国国王之命出使来到中国，回去后向欧洲报道了中国人使用纸币进行商业贸易的情况，他是最早报道中国使用纸币的欧洲人。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世祖时来到中国，居住了十几年，回国时带走了纸币，并在他写的《游记》中，对元朝纸币作了非常详细的记载，这对欧洲印刷术的产生都有启迪作用；同时，发生在十二三世纪的十字军东侵，也使欧亚两洲各国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接触，十字军从东方带回去的纸币、纸牌、版画等印刷品，也影响到欧洲印刷术的产生。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印刷术被介绍到了欧洲。

公元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欧洲开始出现了用木版雕印的纸牌、宗教画、宗教书籍和小学生用的拉丁文法课本等，其中的纸牌

是最早在欧洲出现的版画印刷品之一。现存最早的欧洲版画印刷品，是公元1423年印的



欧洲现存最古的木版画《圣克里斯道夫像》  
印于公元1423年。

圣克利斯道夫像木版画，这是在德国南部刻印的，其印刷方法和中国的雕版印刷完全相同。此外，意大利的威尼斯也是印刷画像的中心。到15世纪中期，雕版印刷术在欧洲已相当普遍了。与此同时，公元1440—1448年之间，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印刷，这一发明比毕昇的泥活字已晚了400年。虽然二

人在活字印刷的原理上没有多大差别，但是谷登堡用的活字材料是铅、锌、锑的合金，它比以前的木活字、铜活字都易于成型，适于印刷，象这样配合的成分，时至50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在铸字工艺上，使用了铸字的字盒和铜字模，使活字的规格易于控制，也便于大量生产，这比当时中国和朝鲜铸活字时使用的翻砂方法先进得多。他还首创了脂肪性油墨，以代替水性油墨，大大提高了印刷的质量，而且脂肪性油墨也一直为后来的现代印刷术所采用；他发明的螺旋式手扳木质印刷机，改进了印刷的操作，在世界各国沿用了400多年。谷登堡对活字印刷的一整套革新技术，奠定了现代印刷术的基础，因此，谷登堡的功绩是永远值得后人纪念的。在谷登堡发明铅活字之后不久，活字印刷术很快在欧洲各国流行起来。谷登堡这一发明是否直接接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有些西方史学家认为西方活字印刷术是由中国传去的；但有的学者认为还缺乏可靠的证据，不过可以肯定的说，欧洲的印刷术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产生的，这

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印刷术也影响了埃及。19世纪末曾在埃及某古城废墟中发现了50张木版印刷品，都是用古阿拉伯文字印的伊斯兰教的祷词、符咒和《古兰经》残页，据说是印于公元900—1350年之间，其印法和中国的印法极为相似。因此，西方学者认为可能是在蒙古军西征时，把印刷术传到阿拉伯各国之后，于14世纪初年，由旅行者和商人带到了埃及。这样，中国印刷术也就传到了非洲。

此后，中国印刷术也先后传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中国印刷术传遍了或影响了全世界。

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它的广泛传播，为全世界各国出版大量书籍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为全人类享受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了不起的贡献。

今天世界各国的印刷技术，正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向着现代化迈进。每天早晨，人

们都能按时阅读各种报纸，经常按期收阅各种杂志，书店里的读物丰富多采，精美可爱！亲爱的读者，当你们捧起一本爱不释手的读物，津津有味地阅读，沉浸在书的世界里而感到无限幸福时，你们将会有什么感想呢？



#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书目

## 一、历史、地理

- |      |               |     |     |
|------|---------------|-----|-----|
| 1    |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 黄石林 | 朱乃诚 |
| △ 2  | 中国史前文化        |     | 王仁湘 |
| 3    | 商周青铜文化        |     | 李先登 |
| △ 4  | 中国农民起义史话      |     | 张仁忠 |
| △ 5  |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革新与变法 |     | 徐 凯 |
| 6    | 中国古代官制        |     | 王天有 |
| 7    | 中国古代法制史话      |     | 李用兵 |
| 8    | 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     |     | 葛剑雄 |
| ○ 9  | 中国的名山与大川      |     | 谢凝高 |
| ○ 10 | 中国的名胜古迹       |     | 葛晓音 |
| 11   | 中国历代名城纵览      |     | 董黎明 |
| ○ 12 | 中国古代都城        |     | 吴松弟 |
| 13   | 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     | 周振鹤 |
| △ 14 | 中国历代帝王陵寝      | 黄景略 | 叶学明 |
| 15   | 中国古代民族        |     | 李清和 |
| 16   | 中国古代礼仪制度      |     | 朱葆新 |
| 17   | 中国地名史话        |     | 徐兆奎 |

## 二、文化、科技、教育

- |      |             |     |     |
|------|-------------|-----|-----|
| △ 18 | 汉字发展史话      |     | 董 琨 |
| 19   | 中国古代书籍史话    |     | 李致忠 |
| △ 20 | 中国的类书、政书与丛书 |     | 戚志芬 |
| 21   | 中国古代的字典词典   | 张明华 | 张耕夫 |
| 22   | 中国报刊史话      |     | 王凤超 |

23	中国的文房四宝		齐 徽
24	中国的石刻与石窟	徐自强	吴梦麟
△25	中国的印章与篆刻	王志敏	冯淑华
△26	中国的书法		欧阳中石
27	中国古代考试制度	郭齐家	顾 春
28	中国的书院		朱汉民
29	中国古代藏书史话		焦树安
30	中国的著名寺庙、宫观与教堂		余桂元
31	中国的佛教		潘桂明
32	中国的基督教		周斐番
33	中国的伊斯兰教		蔡惠彬
34	中国的道教		金正耀
△35	孔子与儒家		阎 楠
△36	老子与道家		李 申
37	中国的经学		陈克明
△38	中国的地方志		周 迅
39	中国的年谱与家谱	朱新夏	徐建华
40	中国古代著名史籍	毕素娟	熊国祯
41	中国古代著名科学典籍	吴洪印	湛穗丰
△42	五经四书说略		李思敬
43	中国古代科技史话	金秋鹏	蒙 谷
○44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杨 造
△45	中国印刷史话		张绍勳
46	中国造纸史话		潘吉星
△47	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	陈久金	杨 怡
△48	中国古代数学		郭书春
△49	中国古代物理学		戴念祖
△50	中国古代化学		赵匡华
51	中国古代生物学	汪子春	程宝坤
△52	中国古代地理学		赵 荣
53	中国历代刑罚与断案史话		李汝清
○54	中国古代医药卫生	魏子孝	聂莉芳
55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	何芳川	万 明

56	中国翻译史话	戴仲伦
57	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王晓秋
58	中国人留学史话	吴 霓
○59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	毕 诚
○60	中国人的姓名字号	吉常宏
61	中国古代的清官与廉政	高洪钧
△62	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	潜明兹
○63	台湾传统文化寻踪	徐博东 张默音
△64	中国古代学校	郭齐家
○65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史话	朱仲玉
○66	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	潜明兹

### 三、经 济

67	中国历代的人口与户籍	杨子慧	张庆五
△68	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		张宇军
69	中国古代商业		吴 慧
△70	中国历代货币		郭彦岗
71	中国古代度量衡		丘光明
△72	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		朱学西
73	中国古代的纺织与印染		赵翰生
74	中国古代矿业	李仲均	李 卫
75	中国古代冶金史话		刘云彩
76	中国古代农业		李根蟠
77	中国古代交通		王崇煥
△78	南洋华侨史话		巫乐华
△79	美洲华侨史话		陆国俊
○80	中国名物特产集粹		邵 秦
81	中国古代陶瓷		李知晏
△82	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戚 嵘
△83	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		张静芬

### 四、文艺、体育

△84	中国古代绘画	徐 政
-----	--------	-----

△85	中国古代音乐	伍国栋
△86	中国古代舞蹈	刘 芹
△87	中国古代戏曲	周传家
○88	中国古代诗词曲赋	刘耕路
○89	中国古代著名小说	张国凤
90	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	桑吉扎西
○91	中国古代棋艺	徐家亮
△92	中国古代杂技	刘荫柏
○93	中国古代武术	任 海
○94	中国古代体育	任 海
△95	中国雕塑史话	顾 森

## 五、军 事

○96	中国古代著名战役	张习孔	林 岷
97	中国古代兵器		王兆春
△98	中国古代兵书		柳 玲
99	中国古代兵制		黄水华

## 六、生活习俗

100	中国古代服饰	戴钦祥	陆 敏	李亚麟
101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林乃燦
△102	中国古代民间工艺			王冠英
△103	中国古代建筑			楼庆西
△104	中国古代园林			耿刘同
△105	中国古代汉族婚丧风俗	李仲祥		张发岭
△106	中国少数民族婚丧风俗	严汝嫻		刘 宇
○107	中国古代汉族的节日风情	朱启新		朱筱新
○108	中国少数民族的节日风情	胡起望		项美珍
109	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	顾鉴塘		顾鸣塘
△110	中国古代礼俗			王炜民

○表示小套书目      △表示中套书目